



HKU
BUSINESS
SCHOOL
港大經管學院

香港經濟 政策綠皮書 2024



目錄

序言	111
引言	112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	115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	121
聚焦香港收入不均	133
人口老齡化對香港未來醫療衛生開支的影響分析	147
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	163
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領英社交資料佐證	171
知識產權商業化有利香港經濟高質發展	183
偉大城市：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	197
參與學者	207

網上版本



序言

我欣然向大家介紹港大經管學院傑出學者們編纂的第三冊《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這本年度刊物展示了我們學術界在應對香港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經濟機遇與挑戰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和分析。

在全球疫情大爆發後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背景下，為我們的城市制定明確的戰略方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今年的綠皮書為我們在這充滿變數的時期提供了寶貴的洞見和指引。香港大學學者們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專業知識，為我們深愛的城市塑造一個繁榮且具有韌性的未來，正是此刻我們所需要的。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是一項值得讚揚的倡議，我誠摯地向所有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士推薦今年的這部作品。願它激勵我們深思熟慮、做出明智的決策並共同努力，一起克服前方的挑戰，把握機遇。

在此，我向這本出版物的每位傑出作者和貢獻者表示熱烈的祝賀和敬意，邀請您細讀第三冊《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的每一篇文章，與我們攜手共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王于漸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

2024年1月1日

引言

經濟全球化正發生本質上的改變，日益趨於區域化、數位化和以服務為導向，加上地緣政治波譎雲詭，香港經濟面對重重挑戰，探索發展新方向和定位迫在眉睫。港大經管學院銳意為香港經濟發展出謀獻策。延續過去兩年的成功，學院再次發布了《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4》，內容由八個章節組成，涵蓋這個城市未來經濟發展的各個範疇。今年的綠皮書由港大經管學院與香港大學其他學院攜手合作，彙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探討諸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以至公共衛生改革等各方面的問題。希望您能撥冗細閱，並從中獲得啟發，重構更兼容、強韌的香港經濟。

綠皮書首章由 Douglas Arner 教授撰寫，探討香港成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演化進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近年的結構性變化。鑑古知今：香港經歷了 1987 年環球股災和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洗禮，進一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2019 年至 2023 年，因社會動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等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衝擊。隨著全球經濟日益多極化，與其說是日漸衰落，香港的角色或正經歷結構性轉變。香港和新加坡正演變為不同地區的金融中心 — 香港成為中國的中心，而新加坡則成為除中國以外的亞洲中心。為了提升其角色的影響力，香港必須保持優勢、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並改善交易基礎設施。香港的成功將有賴於市場開放的程度、基礎設施配套、制度支援和互聯互通機制。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設立的港幣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儘管可能性不大，然而，貨幣掛鈎的未來會否因為美國當局愈發利用金融制裁手段對付其他國家、公司和個人而產生變化？有見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方翔博士和劉洋博士於文章中探討了香港與美元掛鈎匯率體系的當前狀況和發展。作者認為，掛鈎匯率體系帶來的裨益影響深遠，較環球地緣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短暫挑戰更為持久。文章解釋聯繫匯率體系對香港金融和貿易市場的好處、闡釋港元浮動匯率的好處其實不如預期，同時提出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挑戰及相應的對策，並分析港元與人民幣掛鈎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社會不平等與貧富懸殊是香港的長期問題，為人詬病。方偉晶教授、洪雨林先生、張麗晨博士和朱曉冬教授根據 1981 年至 2016 年期間的人口普查數據，分析香港經濟不平等的情況。研究顯示，由於高收入者工資升幅加快導致薪金不平等的情況惡

化，亦令整體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情況加劇。儘管整體家庭收入中位數有所增長，但最貧困家庭的收入持續倒退。此外，作者觀察到男女薪資越趨平等，並發現自香港回歸以來，政府轉移開支的財政手段在減少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更為顯著。隨著政府在高等教育上不斷投入資源，令大學入學人數大幅增長，也改善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間工資不平等的情況。研究結果表明，若無政府干預，香港的不平等狀況或更為嚴重。或許在收入分布方面，「小政府」模式可能已站不住腳。

香港面對的另一個長期社會經濟挑戰是人口老齡化及其為公共衛生部門帶來的負擔。貝大為教授、陳禧音女士、Karen Grépin 博士和全劍超博士研究由目前至2040年，香港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健支出的未來影響。作者使用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 (ARIMA) 模型預測未來數十載的整體醫療開支及醫療開支分項。結果顯示，醫療開支的增速自2010年起已超越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目前增速達兩倍。儘管外來移民可能減緩人口老齡化和醫療開支比例的增長，但預期醫療開支佔 GDP 的份額仍將從目前的7%上升至2040年的9%。作者建議政府改善醫療護理的服務效率、提升公共衛生計劃質素、通過新的公共收入來源增加財政空間，並讓香港的醫療保險市場能更有效地釋放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高昂的住屋成本乃窒礙香港經濟發展的另一屏障，不但令本地人才逐夢無望，更令有意在港定居的外地人才望而卻步。王欣儀教授、黃美施教授和王柏林博士研究香港公共房屋 (公屋) 輪候時間漫長的原因和提出對策。政府推出過渡性房屋 (TH) 和輕型公共房屋 (LPH) 計劃，旨在短期紓緩迫切的住房需求。然而，大眾對此等計劃，尤其是在新界地區的成效存疑。作者建議利用數據分析和電腦演算法提高過渡性房屋的使用率及縮短公屋的輪候時間。他們發現住戶與過渡性房屋項目之間存在空間錯配，加上申請流程繁複，導致過渡性房屋使用率不足。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作者建議進行務實且具成本效益的政策改動，包括利用數據分析和市場設計理論改善住屋配對，及提高過渡性房屋的使用率。當住戶對於住屋選擇有不同偏好時，透過中央電腦演算法可顯著改善住屋的分配情況、使用率和滿意度。

基於種種社會經濟問題，香港有數十萬勞動人口及其家庭已經移居海外。與此同時，受香港政府積極進取的人才計劃所吸引，過去一年也有數十萬人從外地來港。人口流動對香港的勞動力和人才庫有何影響？關穎倫博士、鄧希煒教授和王柏林博士通過分析領英 (LinkedIn) 社交資料和政府統計數據評估香港的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前景。結果顯示，儘管香港近年經歷了人才外流的打擊，但同時也有大量人才湧入，特別是來自中國內地和美國的人才。與外流的人才相比，這批新增人口的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高，但與全球聯繫較少，族裔多樣性也較低。目前，香港的人才庫仍然強大，且具有國際競爭力。作者建議香港政府繼續實施各類政策挽留和吸引人才，以確保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此外，香港亦應利用各種行政和企業數據集來監察整體勞動力狀況，藉以改善政策設計，並就與事實不符的敘述提出疑問和反駁。

綠皮書的最後兩章探討了香港要發展成為新的國際樞紐應專注的兩個重要領域。根據中央政府的十四五規劃，香港將加強其現有角色並在八個業務領域中探索新的角色，成為區域或國際樞紐。此等領域中，知識產權交易可能最鮮為人知，即使全球知識產權活動已逐漸以亞太地區為中心。鄧希煒教授和張超藝先生闡釋香港如何成為知識產權交易的地區樞紐，以及此一發展為何對香港作為創新及靈活的經濟增長體至關重要。為了實現此目標，香港應該專注於加快知識產權商業化和融資進程。香港可以借鑒中國、美國和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作者建議八項策略，旨在提升香港知識產權商業化的生態系統，包括制定知識產權相關的投資標準、建立評估準則、加強與內地協調，以及深化國際合作。

在最後一章中，陳南祿教授詳述成為航空樞紐，實乃一個城市能成其大的關鍵因素。他認為，實力雄厚的本地國際航空公司在推動其基地作為旅遊、行旅、服務和商業中心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更可為當地經濟作出可觀貢獻。陳教授以威尼斯、長安和羅馬這幾個偉大的歷史城市為例，提出成為主要貿易和運輸中心的重要性，更將此要素對照現代偉大城市如倫敦、新加坡、香港、東京、杜拜和紐約等進行闡釋。文章亦強調香港須保持和進一步提升其作為航空樞紐的地位，並建議改善航空運輸設施和基礎建設、強化本地航空公司的角色以及發展相關產業，以確保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我們期望透過此綠皮書引起社會對現時政策的思考及討論，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地位、解決存在已久的社會經濟挑戰，以及應對全球經濟變革的衝擊。誠如其後八篇文章所闡述，香港當前風險與機遇並存。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機會，同時規避風險。通過與政策制定者和商界緊密合作，我與同仁希望我們就各種政策問題提出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見解，能為香港指引前路，並發掘嶄新的研究領域。

鄧希煒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 (對外事務)
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2024年1月1日

香港結構 演變與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 展望



香港結構演變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展望

Douglas Arner

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2023年是富有挑戰性的一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年初迅速重新開放復常，令人熱切期望兩地經濟及金融隨之迅速反彈。然而，復甦步伐比預期慢，原因在於內地經濟中存在各種結構性挑戰，尤其是房地產問題持續、消費支出疲弱，以及地緣政治問題揮之不去。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導致內地在全年增長放緩。除此之外，在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下，美國利率急升也直接影響香港。

這些情況及其他因素等引致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招股的集資額接近歷史低位，於2023年底下降至20年來的低水平。¹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後將何去何從？

展望2024年，有三大元素至關重要：香港賴以演進成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種種因素、其角色的廣度，以及尤其在2019至2023年期間的結構性變化。

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

追本溯源，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可說始於1987年10月。當時因美國在10月19日出現史無前例的「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而觸發環球股災，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隨之停市，市場面臨破產危機，當局為期貨結算所，亦即香港期貨保證公司籌集資金。²

1 Hong Kong IPO market revival on the cards amid favourable interest-rate outlook, China policy easing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business/markets/article/3246630/hong-kong-ipo-market-revival-cards-amid-favourable-interest-rate-outlook-china-policy-easing>)

2 參看D. Arner et al., *Financial Markets in Hong Kong: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d ed.)

股市風暴過後，香港針對本地金融制度及基礎系統的弱點進行全面檢討。政府於1989年成立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其後將股票、期貨和結算公司合併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在聯交所上市。因應早前引致在1983年建立聯繫匯率制度的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於1993年成立，將維護貨幣制度與銀行監管職能結合，而成為香港的中央銀行，並奠定香港金融體系中的基礎設施功能。隨着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起步，這些系統基建更得以發揮效用，尤其通過國際熟悉的香港法律框架，吸引外資流入香港，以及自1990年代初，開始為內地企業進行集資活動。

九七回歸之際，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區域中心，同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更令香港的金融體系經歷了嚴峻考驗。這次危機也為香港此後加強其金融監管框架和金融基礎建設提供了重要機會。《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安排，其中包含貨幣和財政方面的清晰規定，為上述過程提供明確依據，有利於香港崛起成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與此同時，中國亦重登世界主要經濟體之列，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尤其如此。

在這段期間，儘管面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挑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顯著提升。此一危機過後，香港不僅並未如其他國家或地區般受到重創，反而可說更從中國的後危機刺激措施和持續的經濟成長、開放改革中獲益，同時也受惠於國際監管當局的應對措施。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應對措施促使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圍繞地區結構重組，包括在香港和/或新加坡兩地的控股公司。

2008至2019年期間，香港成為中國內地資金出入以及內地公司集資和外國投資內地公司的主要中心，與紐約和上海/深圳並肩而立。香港也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鎮。在2015年內地金融動盪之後，內地開放金融，加上其資金進出步伐放緩，香港作為內地融資活動進出的主要國際樞紐地位更得以鞏固。

直至2019年上半年，香港一直被視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與倫敦和紐約並駕齊驅，在整個亞洲時區發揮關鍵作用。此一進程所以能夠加強，皆因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許多區域功能重新集中。

2019年：高峰點、轉折點，抑或另有看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在於股本融資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如香港交易所首次公開發行量所示），以及根據Z/Yen等調查排名，在中國和外國公司的國際和地區總部方面以及外匯和衍生工具交易量方面（如2019年國際清算銀行每3年進行1次的調查結果³），都處於領先地位。

概覽：

首次公開招股（2019年全年）：全球排名第二；為數183間上市公司一共集資401億美元⁴

管理資產（2019年）：年增長20%至28.769萬億港元（3.694萬億美元）⁵

外匯（截至2019年4月底，每日成交額）：6320億美元（排名第四）

場外利率衍生工具（截至2019年4月底，每日交易額）：4360億美元（排名第三）

然而，在2019至2023年期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則面臨重大挑戰。期內，全球、區內以及中國等各經濟體都正經歷結構性轉變。

有人或會提出：2019年上半年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歷史上的高點，自此之後，一如歷史上世界各地和亞洲的許多其他金融中心，難免桂冠旁落而被其他城市取代。基於種種原因，筆者卻認為現時大概不會歷史重演，即使從2019年中至2022年底這段期間，香港面對多項重大挑戰，包括本地社會動盪、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摩擦等。

筆者反而認為這3年也許標誌著香港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結構性轉變。這點所以事關重大，因為香港以至華南地區曾屢次經歷結構性轉變。香港的轉變包括香港開埠（標誌著澳門和廣東角色的重大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英國地位的重大拐點）、1987年（正如前述）以及1997至2003年（包括主權回歸、亞洲金融危機、科網熱潮爆破和「沙士」疫情）。

3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Over-the-counter (OTC) Derivatives Markets in 2019 (bis.org) (<https://www.bis.org/statistics/rpfx19.htm>)

4 Hong Kong's IPO Market: Resilience and Innovation (ft.com) (<https://www.ft.com/partnercontent/brandhongkong/hong-kong-ipo-market-resilience-and-innovation.html#:~:text=The%20Hong%20Kong%20stock%20exchange,and%20raised%20US%2440.1bn.>)

5 AWMAS_2019_EN.pdf (sfc.hk) (https://www.sfc.hk/web/files/ER/Reports/AWMAS_2019_EN.pdf)

就2019至2022年期間而言，關鍵的結構性轉變源於地緣政治摩擦，尤其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這些局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長期的演變過程，其中涉及美國經濟規模相對縮減以及全球經濟日益多極化，包括多種動力泉源和多個極點。在這個表述之下，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主要貿易國和全球領先的投資國和投資目的地之一，已重新崛起而成為與歐美平起平坐的全球動力泉源之一。其他潛在的動力泉源，包括以印度和東協/亞洲為主的地區（除中國外）也在迅速增長和發展。在這個表述之下，尤其是在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貨幣和金融基建可靠性受到質疑之際，各極點不僅是一個金融範疇，也是為一個主要金融中心的腹地，賴以為其經濟發展和與其他極點的互動提供服務。

在這個表述之下，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如以往般直接競爭，反而在結構和功能上愈趨不同。香港成為中國的中心，新加坡則成為亞洲（不包括中國）的中心。中國即使增速放緩，仍將是今後全球主要的經濟和金融極點之一。同時，隨着亞洲（不包括中國）地區的快速發展，建立其中心的需要就愈發明顯。

這從兩個地區持續增長的外匯、衍生工具和管理資產的總值，即可見端倪。香港較適合當中國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則較適合當東盟和廣泛亞洲（不包括中國）地區的中心。

然而，這確實意味著兩地的結構演變。對香港來說，2019年並非高峰點，而是轉折點。

展望前景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應如何增強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顯而易見，當務之急在於致力維持和鞏固相對內地的現有優勢，其中包括資本、資訊和人員的自由流動，輔之以穩定的法律、貨幣、金融和監管基建。在這些領域若不時加以警惕，一旦面臨相對競爭對手的差異化優勢和對比優勢，香港或會遇到遭受削弱的風險。同時，香港亦須繼續加強與國內腹地的聯繫，而這也是所有金融中心所須依靠的關鍵。但歸根究柢，香港扮演的是中介角色，因而必須在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北美和東協/東亞，特別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地區）之間持續開闢與財經連接走廊的聯繫，同時尋求識別新興的潛在機會領域（如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也意味著需要不斷改進交易基礎設施，尤其是支付相關範疇，皆因在這方面日益多極化已成一重大趨勢，也是機會寶庫。

放眼未來，很明顯，香港的角色像過去的一些時刻一樣，正朝着新的方向演變。成功並非必然，但開放性、基礎設施、制度和互聯互通，亦將一如既往，繫於其中。

從中心範疇的角度來看：

資本市場。在保持透明度、開放性和監管質量的同時，也需要聚焦集資和投資所需的新客戶。集資方面，最佳機會也許來自創新、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的融資。各範疇都需要香港交易所和監管機構的努力，並以香港為本而發展更廣泛的創新生態系統，⁶ 這與美國矽谷不無相似之處。將深圳的科技優勢與香港的金融市場和基建結合成為既定目標已久，卻並非易事。話雖如此，關注研究和發展資金，予以支持，以及實體和數據連接的相關安排，則為打造新興中心奠下發展基礎。

資產管理。儘管管理資產的總值逐見增加（截至 2022 年底，達到 30.541 萬億港元/3.912 萬億美元），但此一環實在有機也有危，成功關鍵在於招徠有能力更廣泛投資的中國機構投資者。而致力吸引私人財富來港亦至關重要。這方面的重點在於建立所需專長和服務所賴的人力資本；雖然可見相關進展，但仍需加倍努力。

結構性融資。外匯和場外衍生工具所需條件在於香港法律和監管制度的吸引力，以及其相對內地的持續開放性。展望未來，中國的發展以及其資金出入，將對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構建多極化支付和財資管理框架，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支付與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已是十多年來一直持續的項目，而在近期地緣政治摩擦加劇，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國家對俄烏衝突的對策，就更加快進度。除了這些結構性轉變之外，支付和流動資金基礎建設將對通過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或缺。⁷ 香港在新興多極金融體系中的樞紐角色，今後更上層樓的機會還有很多，不限於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

6 R. Buckley, D. Arner & D. Zetsche, *FinTech: Finance, Technology and Reg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7 Ukraine, Sanctions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The Weaponiz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End of Global Monetary Hegemony? - AsiaGlobal Papers No. 7 (hku.hk) (<https://www.asiaglobalinstitute.hku.hk/news-post/ukraine-sanctions-and-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weaponization-digital-finance-and-end-global-monetary-hegemony>)

香港 聯繫匯率制度 損益評估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損益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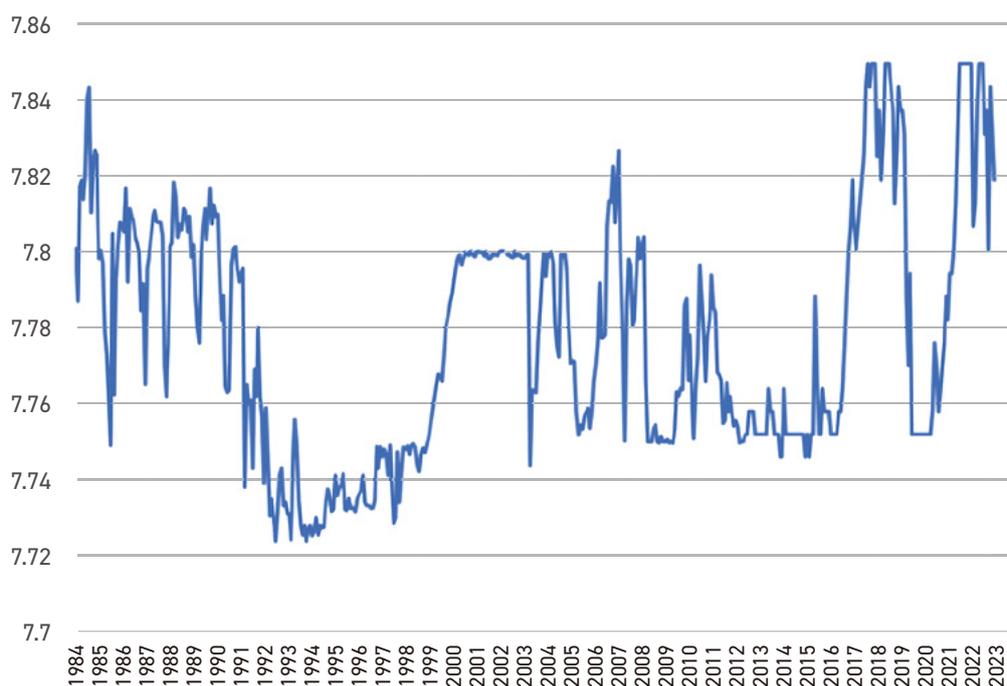
方翔 劉洋

自1983年起，香港一直實施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聯匯制度)。在這40年間，制度運行穩定，順利應對了多次重大挑戰，如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等。值此制度40周年之際，本文將探討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勢下聯匯制度的現狀與發展。基於最新國際經濟學研究成果，通過量化指標，分析不同匯率制度對香港的利弊。

1. 聯匯制度

在當前香港聯匯制度下，匯率維持在窄幅兌換範圍，即1美元兌7.75至7.85港元。與眾多固定匯率制經濟體不同，香港的貨幣基礎100%由美元資產支援，因此任何貨幣基礎變動都會伴隨香港金融管理局外匯基金所持美元資產的數量變化。充足的國際儲備為聯匯制度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堅實基礎。聯匯制度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的兌換保證來實現：金融管理局承諾以7.75港元兌1美元的強方兌換保證水準賣出港元，以7.85港元兌1美元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買入港元。當港元需求過剩(不足)時，金融管理局會在市場上賣出(買入)港元以穩定其價格。近40年來，聯匯制度雖然經歷了數次技術性調整，但總體運作穩健。如【圖1】所示，港元兌美元的匯率成功地維持在匯率目標區間內。

圖1 港元/美元匯率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資料庫

近年來，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致有觀點認為香港應考慮調整其聯匯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變化是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頻繁，以及中美關係的日趨複雜化。此外，近期美國聯邦儲備局（聯儲局）在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的17個月內，將聯邦基金利率從零升至超過5%的水平。儘管香港並未遭受與美國同等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聯匯制度，也被迫隨之提高利率，不利於本地經濟。港元兌美元的匯率在過去數年多次達到1美元兌7.85港元的弱方兌換保證水平。香港的外匯儲備資產從2021年的高點至今已下降了15%。多家知名對沖基金都公開宣稱將通過期權持倉做空港元，押注目前的聯繫匯率將走向終結。聯匯制度在當前確實面臨重重挑戰。

然而，筆者認為，香港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挑戰是暫時的，而聯匯制度為香港帶來的好處將更為持久。

以下將對香港匯率制度的各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二節討論聯匯制度為香港金融和貿易帶來的益處。第三節闡述港元浮動匯率帶來的好處未如預想之大。第四節則指出維持聯匯制度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對方案。第五節分析港元與人民幣掛鈎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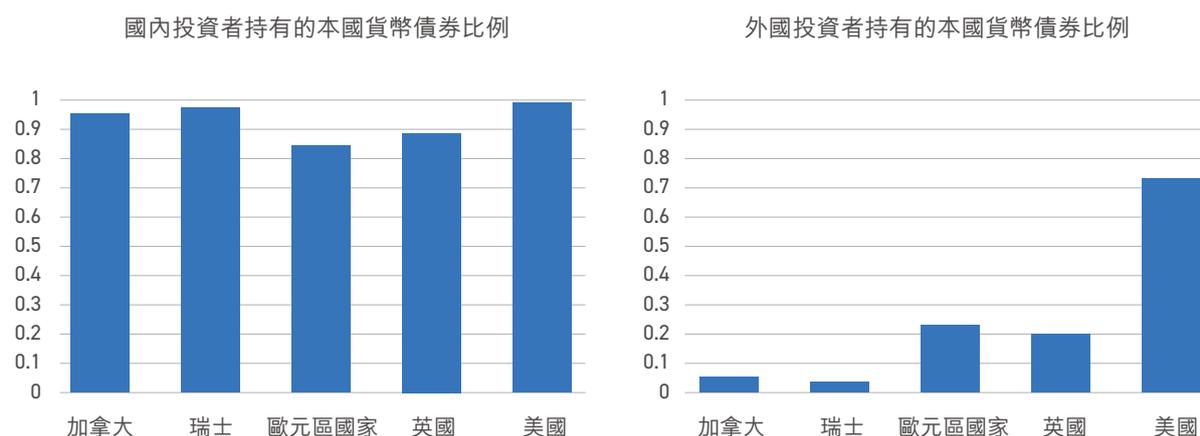
2. 聯匯制度的好處

國際金融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企業重要的融資平台，吸引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2022年香港的對外債務融資達到了1萬5千億美元，約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倍，遠高於股權融資。債務融資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港元與美元掛鈎的制度基礎。

首先，若特區放棄聯匯制度，企業融資能力將面臨巨大限制。最近的研究顯示，債務投資者對貨幣有強烈偏好，往往只會持有本國貨幣。從【圖2】(左)可見，各國的本國投資者持有的本國貨幣債券佔90%左右，而美國投資者的此一比例更接近100%。相比之下，外國投資者基本上不持有債券發行國貨幣的債券，而會追求投資者本國貨幣的債券。因此，如果港元浮動，企業將難以通過港元債務吸引外國投資者，而需發行美元、歐元、英鎊、日圓等外幣債務來吸引相應的投資者。大企業須面對較高融資成本和風險，而小企業則會處於無從選擇的困境。研究進一步發現，即使在發達國家，歐洲、英國和加拿大的中小企業也很難發行外幣債務，只能依賴美元債務來吸引外國投資者。反觀美國的中小企業卻能輕鬆地通過美元債務，從世界各地獲得融資。這是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為該國帶來的眾多優勢之一。在目前的聯匯制度下，香港的企業也同樣享有這一融資優勢。

圖2 投資者持有本國貨幣債券比例



資料來源：Majors, M. ; Neiman, B. ; Schreger, J. (2020)

其次，發行外幣債務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匯率風險。在港元貶值時，雖然需要償還的外幣債務款額不變，但本幣債務則有所增加。作為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債務的一大優勢在於確定性，但外幣債的現金流則因極具不確定性，而不利於企業的生產、投資、融資，以及其他決策程序。根據【圖2】（右），美國企業的對外債務有73%由美元計價，而其他國家（包括歐元區國家）只能發行20%的本幣債務，其餘80%的外幣債務就須承受匯率風險。可見一旦港元與美元脫鉤，香港的1萬5千億美元債務中，將有1萬2千億美元（約9萬4千億港元）的貨幣風險。按照每年匯率一般10%的波動來計算，港元有30%的可能性在1年內貶值10%（1個標準差）。即使以外幣計價的債務數額固定，仍會導致以港元計價的債務上升9千億港元，相當於GDP的34%，而產生系統性風險。縱然企業有可用的對沖方法，但由於成本較高，實際上進行全面對沖的企業不多。

除了增加融資途徑和排除匯率風險外，與美元掛鉤還有融資成本較低的優勢。美元被視為安全資產，備受避險資金的追捧。儘管傳統觀點認為這一優勢主要體現在美國國庫債券上，但近期研究發現，這一效應也延伸到所有以美元計價的固定收益產品。相較於同等風險的其他貨幣債券，美元債券的收益率平均減少1.8%，這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優勢。而美國國債相對於美元債券所享的額外折價僅為0.2%左右。港元債券可以部分享有美元債券的低融資成本優勢，而香港企業可選擇以美元融資而毋需承受匯率風險。相反，其他國家公司若要受惠於美元債券的低成本優勢，則不得不承擔匯率風險。

上述各種融資優勢不僅有利於有意集資的公司和個人，更有助於香港金融機構的發展。香港的GDP中有五分之一來自金融業，而業界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融資活動、金融交易和資金流動。儘管資金和融資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但其通過金融活動創造的價值確實惠及香港經濟和市民。聯匯制度為資金選擇來港創造了有利條件，因為它既使投資者無需顧慮匯率風險，又增加投資者對港元資產的需求。這有助於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和金融交易，進一步推動香港金融業和整體經濟的繁榮。

國際貿易

作為一大國際貿易樞紐，香港的貿易量為其GDP 4倍有多。相較之下，其他各大經濟體的貿易量則往往不高於其GDP。一如金融業，貿易佔香港的GDP五分之一，對整個經濟體系發展的驅動作用至關重要。在這樣一個高度依賴貿易的經濟體中，匯率波動對企業的收入和利潤產生的影響尤為顯著。由於本地商業活動風險遠低於國際貿易，企業往往會因匯率波動而對國際貿易望而卻步，因而影響整個市場的廣度和發展潛力。儘管部分金融工具可以幫助企業對沖匯率風險，但往往涉及高昂成本，引致降低匯率風險的代價不菲。香港採取的聯匯制度為進出口企業提供了免費的風險對沖，為營商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環境。

轉口貿易在香港的國際貿易中佔據很大比重，香港扮演着貿易中介和物流中心的角色。在貿易結算中，除了港元和美元之外，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也佔一定的比例。部分傳統觀點主張以貿易量為權重與一籃子貨幣掛鉤，藉以減輕匯率風險。然而，根據近期研究，無論採用何種貨幣結算，國際貿易中商品的價格始終對美元保持穩定。換言之，使用本地貨幣結算不代表就消除了貿易中的匯率風險，而現有最好的降低風險的方法就是與美元掛鉤。

研究顯示，在同等條件下，固定匯率制度使雙邊貿易量較浮動匯率制度提高了38%。按照現有貿易量和對GDP的貢獻，固定匯率帶來的穩定的貿易環境大幅提高了香港進出口貿易總量，以及貿易產業的產值，令香港的GDP得以提高8%。然而，近年來香港的港口貨物吞吐量不斷下滑，或許意味著香港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地位正面臨挑戰。在當前多元化、競爭激烈的國際貿易市場中，聯匯制度能保持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並維護其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

3. 浮動匯率的得益與成本

固定匯率經常被詬病的弊端是中央銀行喪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權。例如，從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美國聯儲局為了應對高通貨膨脹而將聯邦基金利率從零升到5.25%。由於聯匯制度，香港儘管面對與美國不同的通脹壓力，也被迫以同樣的速度提升利率。這種被動的貨幣政策或與本地經濟的政策目標不相一致，甚至有損本地投資和融資活動的效率。過去25年，香港和美國通貨膨脹之間的相關性僅為-0.02。同樣，在本地經濟低迷期間，香港缺乏靈活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或拯救金融市場。

本節將闡述以下論點：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而言，即使匯率浮動，其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也有限。基於香港在國際貿易中主要從事轉口貿易這一特徵，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作用亦不宜高估。

環球金融對浮動匯率經濟體的溢出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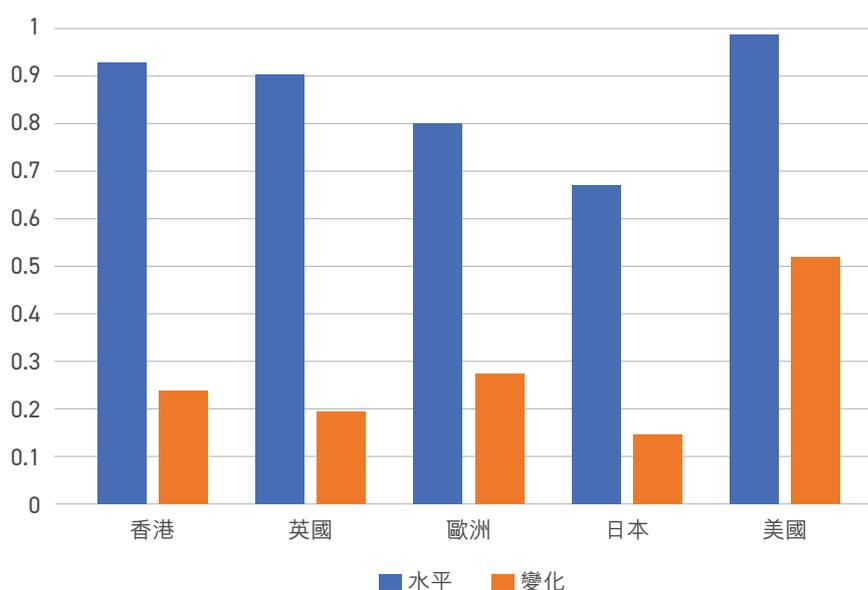
近年來世界金融市場變得愈發一體化，跨國資本流動增長迅速。根據近期研究，全球資本流動和風險資產價格均由相同的共同因素驅動，與美國貨幣政策高度相關。美國聯儲局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1%時，全球風險資產價格就下降8%，而各國國內和外國信貸則減少5%。這一現象對浮動匯率國家同樣適用，令人不禁重新審視浮動匯率的優勢。浮動匯率制度未如傳統觀點所示足以抵消外部經濟衝擊，而使本國的金融市場免受外部經濟動盪影響。

美國貨幣政策藉以發揮強大跨國影響力的傳導機制之一，就是其對國際投資者風險承受力的影響。作為全球資本市場的主導貨幣，美元利率的任何變化都會改變國際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的冒險行為。研究表明，美國加息將明顯降低投資者的風險承受力。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長期以來面臨大量資金流入和流出；即使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亦自然會因國際投資者的冒險選擇，受美國的貨幣政策所影響。

許多人期望通過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來恢復貨幣政策的自主權，但實際上，浮動匯率國家的貨幣政策自主權也不大。根據研究，浮動匯率國家的利率變化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變化的依賴程度是0.54，亦即若美國聯儲局提升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浮動匯率國家就會平均提升本國政策利率13個基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本地金融市場參與者而言，實際借貸利率比直接的中央銀行政策利率更為重要。實際借貸利率與中央銀行政策利率之間存在的利差，反映出市場上的資金供需和流動性情況。以香港的銀行同業拆息率為例，【圖3】顯示，其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93。相比之下，美國的銀行同業拆息率與聯邦基金利率的相關性為0.99；英鎊、歐元和日圓等其他主要浮動匯率經濟體的銀行同業拆息率與聯邦基金利率的相關性則分別為0.90、0.80和0.67。儘管這些經濟體都採用了浮動匯率制度，但它們的利率與美元利率的高度相關性仍與香港相似。相較於利率水平，利率變化更能反映各國利率短期波動的聯動程度。至於銀行同業拆息率變化與聯邦基金利率變化之間的相關性，港元的相關性僅為0.24，而美元、英鎊、歐元和日圓的相關性則分別為0.52、0.20、0.27和0.14。

圖3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與各國銀行同業拆息率的相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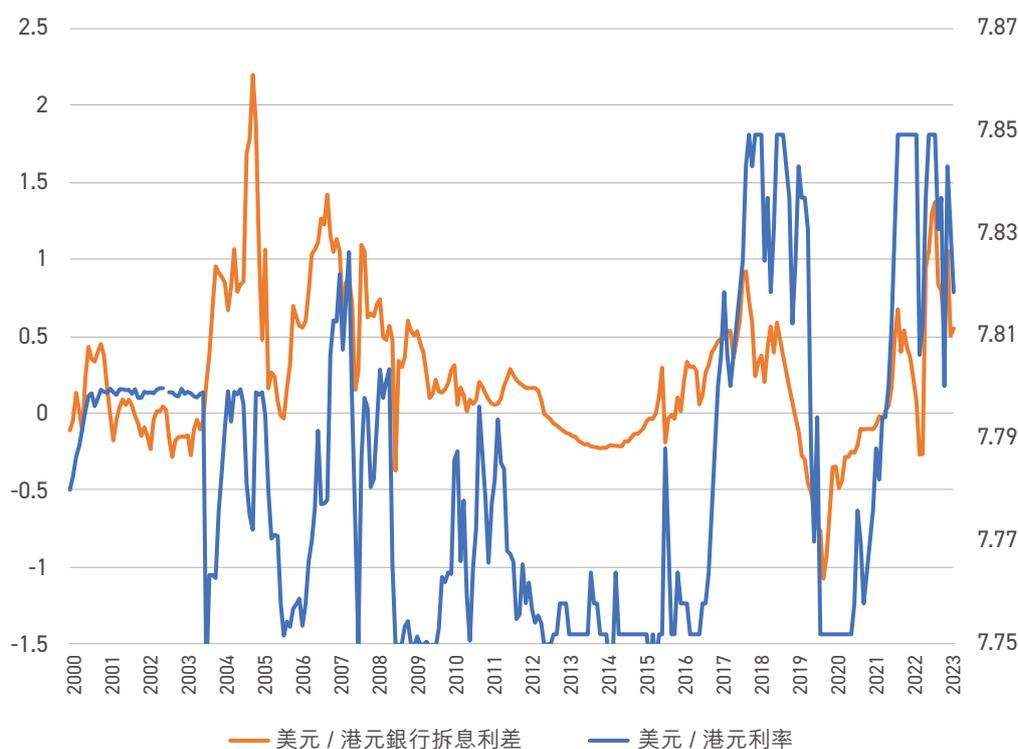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資料庫

【圖3】傳遞了兩個重要資訊。一、即使採取浮動匯率制度，銀行同業拆息率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仍然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二、香港實際的銀行同業拆息率變化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變化之間的相關性甚低。這種差異反映出本地金融市場的供求因素，說明即使在聯匯制度下，港元利率仍有調控的空間。

【圖4】進一步解釋美元和港元銀行同業拆息率差異所反映的重大經濟和金融市場狀況，與港元匯率的波動有關。圖中左軸顯示美元與港元的銀行同業拆息率的差距，右軸為美元對港元的匯率。當港元的銀行同業拆息率高於美元時，通常意味著港元市場需求強勁，足以導致資金流入，導致港元升值。即使在最近港元接近7.85港元兌1美元的弱方兌換保證匯率水平時，此一機制仍然有效：港元在銀行同業拆息率上升之際會隨即升值。

圖4 銀行同業拆息利差與港元匯率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資料庫

貨幣政策自主性對香港好處有限

正如前文所述，浮動港元並不能使香港獲得高度的貨幣政策自主性。這裏進一步闡述，為何貨幣政策自主性與浮動匯率對香港的好處實在有限。傳統的觀點認為，如果中央銀行可以自主制定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就能調節本地就業和通脹，而浮動匯率則能實現對外收支平衡。然而這一邏輯只適用於專事生產貿易品的大國，而非如香港般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體。香港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間，在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國之間的产品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終的進出口數量依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最終產地和銷售地的供求關係。浮動港元只能改變在香港增值部分的相對價格，增值部分在整體的貿易量中佔比甚小，因此進出口價格主要受最終產地和銷售地之間的匯率影響，而非受港元作為中轉站所影響。

再者，全球大部分商品貿易都以美元計算，進出口價格對美元於是相對穩定。因此，單方面將港元貶值並不能夠促進出口，因為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不會因港元匯率貶值而下降。浮動港元的好處更因這一因素而進一步削弱。

4. 管理聯匯制度

管理聯匯制度並非毫無代價，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挑戰正是一例。當時東南亞有多種貨幣受到投機性攻擊，部分國家更因而放棄了所用的聯匯制度。香港克服了這次危機，一直維持聯匯制度運作良好。話雖如此，這一經歷也提醒我們，必須時刻準備面對管理聯匯制度的挑戰。

儲備必須充裕

在現有的聯匯制度下，香港的貨幣基礎獲得特區政府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外匯基金的美元資產十足支持，此對保持投資者對聯匯制度的信心至關重要。金管局必須持有足夠的儲備來防止可能的大量資金外流，以及建立投資者對維持港元聯匯制度的信心。

當前，金管局的儲備資產為3萬5千億港元，6倍於本地流通貨幣，兩倍於貨幣基礎，而相當於廣義貨幣的40%。如此的儲備資產水平看來足以應付日常的資金流動。令人憂慮的事實是，從2021年峰值至今，儲備資產已減少了15%。【圖5】顯示香港儲備資產的近期變化，從中可見大幅下跌。持續的資金外流可危及投資者對港元聯繫匯率的信心，而引發進一步資金外流。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要提高儲備資產水平，始能減輕投資者的顧慮。

然而，只要檢視另一指標，即儲備資產對廣義貨幣的比例，其實現況已有先例。從2021年至今，該比例由0.50下降至0.4；而在2003年的「沙士」疫情期間，以及在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期間，該比例更先後兩度下跌，而且跌幅更大。雖然目前外匯儲備資產大幅減少確已對貨幣政策當局敲響警鐘，務須多加留意資金外流壓力，但筆者對香港克服所處困境的能力依然抱有信心。

圖5 外匯儲備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金融管理局

信心所繫

一如上文強調，信心是維持聯匯制度正常運作的關鍵因素。投資者若不相信其持續性，此制度就會很快崩潰。建立投資者信心既需時又費力，但在履行承諾上稍有差池，就足以打破投資者信心。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過往歷次危機中，對維持聯匯制度的堅定承擔，已成為投資者對此制度信心的一大保證。

社會上一直議論紛紛，認為聯匯制度或會無以為繼，而在中美兩國經濟政治摩擦不斷之際，或應加以調整甚至替代。誠然，經貿摩擦使聯匯制度對香港的好處有所削弱。然而筆者相信，從長遠發展來看，有關摩擦只屬短暫，而在這困境中對聯匯制度的堅持，則更能為投資者對港元穩定性的信心注入強心針。

5. 掛鈎人民幣的可能性

除了現有的聯匯制度和浮動匯率以外，香港還可以採取其他形式的固定匯率制度。部分觀點支持港元與人民幣掛鈎，主因包括貿易、人民幣國際化等。

首先，掛鈎人民幣能夠促進內地和特區之間的貿易。香港輸往內地的出口佔本港對外貿易的一半；但由於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以美元計價的貿易額仍遠超人民幣。此外，基於轉口貿易的特點，內地的貿易企業在下階段的定價時仍需考慮以美元結算。由於貨物價格對美元相對穩定，內地企業和香港貿易公司面對的匯率風險，與現行的聯匯制度下的風險相若。因此，即使與內地的貿易有所增加，港元掛鈎人民幣對整體貿易額大概影響有限。上述分析基於貿易貨幣結算和貿易定價現況。隨着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更廣泛應用，若將來在轉口貿易兩端都佔據主導地位，而貨物價格對人民幣又保持穩定，則掛鈎人民幣的貿易優勢相信就能逐漸顯現。

另一方面，港元與人民幣掛鈎能否助推人民幣國際化仍未可知。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的樞紐，大多數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措施都可在當前制度下針對離岸人民幣進行，比如擴大人民幣使用範圍，包括國際貿易、投資和國際儲備、跨境支付和清算等。港元若掛鈎人民幣，即會趨近於離岸人民幣。現時以港元計價的不少金融資產，則會選擇以美元而非人民幣計算，對加強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幫助不大。

掛鈎人民幣亦或會帶來運作上的挑戰，處理不當的話可能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國際資金或因資金管制而受阻，使針對在岸人民幣的貨幣投機活動難以進行。掛鈎人民幣的港元市場深度將變得更大、流動性更佳，金融衍生工具發展更全面，容易成為更直接的投機目標。若出現此一情況，政府就需要以更多的外匯儲備維持港元幣值，以免在金融系統中埋下隱患。

參考文獻

Gopinath, G., Boz, E., Casas, C., Díez, F. J., Gourinchas, P. O., & Plagborg-Møller, M. (2020). Dominant currency paradig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3), 677-719.

Itskhoki, O., & Mukhin, D. (2023). Optimal exchange rate policy (No. w3193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iang, Z., Krishnamurthy, A., & Lustig, H. (2021). Foreign safe asset demand and the dollar exchange rat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6(3), 1049-1089.

Klein, M. W., & Shambaugh, J. C. (2012).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the modern era*. MIT press.

Maggiore, M., Neiman, B., & Schreger, J. (2020).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capital allo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6), 2019-2066.

Miranda-Agrippino, S., & Rey, H. (2020). US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6), 2754-2776.





聚焦香港 收入不均

聚焦香港收入不均

方偉晶 洪雨林 張麗晨 朱曉冬

1. 引言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對香港情有獨鍾，因它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干預最少。這種自由市場與最少政府干預的概念，最早由港英殖民政府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在隨後的數十年間，一直被歷任財政司奉為金科玉律，無庸置疑。在佛利民到訪香港60年後，這座城市成為了亞洲地區的主要金融中心，根據2023年《福布斯》的排名，香港億萬富翁人數僅次於紐約，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它還是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49,800美元。

在經濟成功的同時，香港亦正面臨重大的社會挑戰。香港的房屋市場是全球最昂貴的，樓價高企導致2022年的港人置業率僅為51.5%；相比之下，它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同年的置業率則高達89.3%。據估計，全港約有22萬人居住在面積只有30平方英尺的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其中約有34,000名兒童。¹在香港的住房不均問題背後，是高度的收入不均，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超過了三藩市和倫敦；有意見認為此一差距是2019年香港社會動蕩的主因之一。

儘管香港的收入不均問題經常出現在媒體報道中，但在工資、個人收入、住戶收入和政府轉移開支等橫向不均方面，仍缺乏全面的分析。在本文中，筆者根據香港1981至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對經濟不均進行了系統和多方面的分析，涵蓋了每波約94,000個住戶，即住戶總數的5%。基於所得數據，筆者集中探討1997年回歸前後的種種不均趨勢。有關討論很重要，因為過度的收入不均可能侵蝕社會凝聚力，導致政治兩極化和社會不穩，造成一大公共政策問題。²

1 資料來源：<https://www.scmp.com/yp/discover/news/hong-kong/article/3235398/hong-kong-set-open-community-living-room-residents-subdivided-flats-years-end>

2 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https://www.imf.org/en/Topics/Inequality/introduction-to-inequality>)與布魯金斯學會(<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ising-inequality-a-major-issue-of-our-time/>)圍繞不均的相關討論。

本研究旨在確定過去25年來香港個人工資和住戶收入模式的變化。結果發現，工資不均日益加劇，或由導致整體住戶不均惡化的高收入者引致。儘管住戶收入中位數上升，本研究的結果表明，最貧窮住戶的收入正在倒退。總之，這些發現描繪出一幅香港經濟不均的圖像。再者，也有一些令人意外的發現。筆者觀察到兩性工資趨於平等，而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轉移開支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筆者亦發現高技能和低技能就業者之間的工資差距已見縮減，因為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大大擴充了大學收生人數。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香港的不均現象相信更為嚴峻。在收入分布方面，「小政府」模式在香港可能已站不住腳。

2. 歷史和制度背景

在1950年代的韓戰之前，香港一直扮演轉口港的角色。根據宋(1986)基於特區政府的歷史檔案的估計，韓戰前，香港從中國內地進口貨物中約有80%再轉口海外，貨量相當於當時中國總出口的16%。1951年，聯合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的轉口港角色隨之漸趨式微。

為應對形勢轉變，香港製造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經歷了快速增長。中國內戰期間，來自內地的製造商和資本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和資源，促進了香港的工業發展。黃(1988)在其關於上海企業家移民香港的經典著作中，描述了上海紡織業在1949年之後，如何在港重建起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成為本地經濟的基石。該行業從1950年的132,000個紡錘擴展到1970年的900,000個。此外，玩具和手錶等相關行業也同時蓬勃發展。

隨着製造業基地日益擴充，本地對低薪非技術工人的需求大增，以致大批來自內地的難民湧進填補這些職位空缺。這種工業化的經典情景助長了收入不均，勞資關係涇渭分明。工人的工作和居住條件惡劣；本地工業化進程急劇下，貪污蔚然成風，加上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一定影響(Yep 2023)，種種因素疊加起來，以致香港在1967年爆發暴動，暴力衝突導致51人死亡和近5千人被捕。

新總督麥理浩爵士於1971年11月抵港履任之後，政府開始重建歷經1960年代暴動洗禮的這個殖民城市。麥理浩推出各種政策，為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繁榮打下基礎，包括實施9年免費教育、10年房屋計劃、設立廉政公署，以及興建沙田、屯門等衛星市鎮。1980年代，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合稱「亞洲四小龍」。

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鼓勵外國投資，香港製造業逐漸北移。1980年代，香港教育的擴展令完成高等教育的勞動力比例增加。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大量

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從內地湧入尋求經濟機會。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供過於求，以致高等教育回報有限。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的收入不均與性別收入差距並存。作為製造業中心，大量低薪女工獲聘，Salaff(1995)廣為人知的著作中，就對1970年代香港工廠女工的情況詳加描述。這種職場模式加劇了性別不平等。1980年代服務業的增長為男性和女性創造了大量低薪工作。正如范和雷(2003)指出，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型經濟，加上服務業中較小的性別工資差距，有助於縮窄香港的性別收入差距。

社會對性別問題的意識日強，逐漸縮小的性別收入差距更透過立法方式加以鞏固。平等機會委員會於1996年成立後，立即實施1995年的《性別歧視條例》。在提高性別問題意識和處理性別歧視投訴方面，該委員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社會意識有所提高，女性僱員也從中受惠，以致收入不均大為減輕。

雖然香港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但亦已通過各種計劃致力為窮人提供支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在1993年推出，以協助有需要者，其前身為始於1971年的公共援助計劃。多年來，綜援計劃的援助金額和申領資格屢經修訂，以適應經濟情況的轉變。除了這個計劃之外，政府還實施了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根據父母的工作時數向家庭提供津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以每月獲得津貼。此外，還推出了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等計劃，以協助有需要的家庭。各種援助計劃也為家庭中正接受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子女提供支援，包括持續教育的資助。這些計劃旨在為資源有限的家庭提供支援，但當局仍被批評對本地家庭一直支援有限。

3. 計量化香港不均現象

本文使用特區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數據(普查數據)，其中收集香港總人口的1%(1991年之前)或5%(1991年之後)的樣本。研究包括了8個普查數據波次：1981年、1986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觀察以房屋為基本單位，所以筆者報告中有關不均現象的普查統計數據屬住戶而非家庭層面。每次數據平均有近94,000個住戶(1981年和1986年除外)。普查數據包括每個住戶成員的詳細人口統計特徵和15歲或以上個人的收入變量。

筆者遵循Heathcote、Perri和Violante(2010)以及Heathcote、Perri、Violante和Zhang(2023)的方法，使用住戶預算限制作為組織工具，在不同層次上構建不同的樣

本，以分析收入不均。³ 筆者從個人工資開始，然後加入個人勞動供應以研究收入，並增添其他住戶成員以分析住戶收入，再通過包括非工資收入（例如租金、利息和股息收入）、私人轉移和政府轉移來研究更廣泛的收入指標。筆者根據所得數據探討 1997 年香港交接前後的不均趨勢，研究所得 5 項主要發現總結如下。

3.1 工資不均加劇下，高收入者收入增長加快

主要職業的月薪簡明扼要地顯示，工資和薪金是香港大多數居民收入的最重大分項，只有極少數超富裕人士例外。

從【圖 1】可見，1990 年代初至 2011 年的工資不均程度總體升勢，不論性別都有對數變異數和堅尼系數足以證明。將最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加以對比，更呈現出明顯的模式。頂層 10% 最高收入者的工資升幅尤其顯著，在 1980 年代的男性和 1990 年代的女性之中尤其如此。然而，這種增長趨勢近年來已經放緩甚至逆轉，最高收入者現時的收入約為中位數的 5.5 倍。相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保持相對穩定，雖然近 40 年來在女性之中波幅較大。

3.2 性別平等增強

與 202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laudia Goldin 在 Goldin (2006) 中記錄的全球趨勢一致，筆者也觀察到香港職場中性別平等程度有所提升。許多男性的收入在過去 40 年中停滯不前，而女性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則有所改善。女性的月薪和勞動力供應在整體就業中的份額，已經大大縮窄與男性之間的差距（【圖 2】）。

1981 年，女性的一般時薪只及男性的 60%，女性在整體就業中所佔份額約為 30%。到了 2016 年，這兩項數字分別增加到約 74% 和 50%，儘管自 2000 年代中期以來的增幅已經放緩。

3.3 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溢酬有所下降

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中，技能溢酬，即持有大學學位的就業者相對於沒有大學學位者的工資溢酬，自 1980 年代以來有顯著增長。然而，自 1990 年代初以來，香港的技能溢酬大幅下降，原因在於年齡組別效應：在同一年齡組別中，技能溢酬隨着時間推移有所增

3 筆者可應要求提供有關數據和方法的附錄。

加，但新一代各年齡組別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其技能溢酬起點則較低(【圖3】)。在高技能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兩方面，有以下兩種可能的解釋。

供應方面，1989年和2001年的兩次高等教育擴張，使專上教育的總入學人數大幅增長。根據可供參考的統計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1年)，香港專上教育的總入學率從1980年的10.12%增長到2019年的80.98%。【圖4】顯示，在各個年齡組別中，大學畢業就業者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1965年之後的年齡組別。高技能勞動力供應有所增加，有助於解釋對其工資的下調壓力。

需求方面，雖然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結構變化，有助於縮小性別工資差距，卻未能對高技能勞動力產生足夠需求。【圖5】顯示香港、日本、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高技能、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增值份額。香港高技能服務業的份額與新加坡相當，但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份額則遠遠大於其他經濟體。【圖6】顯示相應的就業份額，其中亦呈現出類似的模式。因此，香港對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的高度依賴限制了其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

3.4 住戶收入中位數趨升而最貧窮住戶收入則倒退

當工資水平各異的個人生活在一起，分享收入和支出，他們的總收入對住戶的整體生活水平有所貢獻。經濟學家使用標準方法將不同規模的住戶收入加以「等值化」，以進行比較(【圖7】)。採用這種方法，再考慮通脹因素後，可見自1981年以來，住戶收入中位數已增加一倍以上。

最底層10%的住戶則未見類似進展，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圖7】中的淺藍色線)更有所下降。近40年來，最貧窮住戶的實質收入已有所減少。

相反，接近頂層的住戶收入增幅在2倍至3倍之間。然而，這一指標並未有考慮來自金融持股或業務擁有權的非勞動收入。

顯而易見，儘管過去40年來本地社會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但收入分布在最底層的住戶的現時收入，反而較40年前為少。

3.5 香港回歸後政府轉移開支的角色更形重要

除了工資和住戶收入，特區政府還為低收入人口提供食物券和優惠服務等轉移開支。筆者將這些轉移開支納入本研究的住戶收入計量中，而產生一項稅前收入計量指標。⁴【圖8】顯示以住戶收入分布中9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之比為指標，考慮到和並未考慮到政府轉移開支的住戶收入不均如何演變。將住戶收入不均（藍色實線）與稅前收入不均（紅色虛線）加以比較，可見政府轉移開支在減輕不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進一步分析頂層和底層住戶收入不均的演變（【圖9】），則可印證特區政府轉移開支對減輕底層不均的影響較為顯著。

將轉移開支在頂層10%、中層10%及底層20%住戶收入分布中稅前收入中的份額加以計算，【圖10】呈現的相關狀況就更加明顯。香港回歸之前，這3個住戶組別的轉移開支份額相似得出乎意料；但在回歸之後，底層住戶組別所獲轉移開支大幅飆升，從大約15%增至接近40%。

由此可得的關鍵啟示，在於從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儘管收入不均顯著增加，特區政府為低收入住戶提供了更多的轉移開支或福利，因而減輕了底層住戶所面對的收入不均。這個結論有別於皮格提和楊（2021），他們只基於工資和薪金計量收入不均，未將政府轉移開支一併考慮。

4. 結論

在本研究中，筆者採用全面的微觀數據來計量香港的收入不均情況，並研究了過去25年來的相關趨勢。筆者發現，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均實由高收入者收入增長加快所致。儘管住戶收入中位數有所上升，本研究結果表明，最貧窮住戶的收入卻在倒退。筆者還發現，政府轉移開支和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資對舒緩貧窮和減輕高技能與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不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香港的不均問題可能更為嚴重。筆者還注意到，過度依賴低技能和房地產服務來創造就業機會，也限制了香港年輕一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最後，筆者應該強調，由於樓價高昂，財富不均可能較本研究中計量的收入不均要嚴重得多。

因此，為了減輕香港的不均現象，特區政府應該在公共房屋方面增加投資，並通過調低進入門檻，擴大高技能服務的就業機會。

4 更準確地說，稅前收入 = 收入 + 其他現金收入（資產收入 + 私人轉移開支 + 政府轉移開支）。由於數據所限，筆者無法在政府轉移開支與其他現金收入兩個分項之間加以區別。然而，筆者認為大部分其他現金收入應該是政府轉移開支，因為私人轉移開支通常只屬小分項，而資產收入在基於調查的數據中往往未能妥為計量。

參考文獻

- Fan, Chengze Simon, and Hon-Kwang Lui.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Narrowing Gender Gap in Wag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Labor Economics*, 10 (5), (2003), pp.609-626.
- Heathcote, Jonathan, Fabrizio Perri, and Giovanni L. Violante. "Unequal We St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7-2006."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3, no. 1 (2010): pp.15-51.
- Heathcote, Jonathan, Fabrizio Perri, Giovanni L. Violante, and Lichen Zhang. "More Unequal We Stand? Inequality Dyna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7-2021."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0 (2023): pp.235-266.
- Piketty, Thomas, and Li Yang.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1981-2020: The Rise of Pluto-Communism?."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6, no. 4 (2022): pp.803-834.
- Salaff, Janet.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ung, Yun-wing.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China's Export Driv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5, 1986, pp. 83-101.
- Wong, Siu-Lun.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 Yep, Ray.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3, (2008), pp. 122-39.



圖1 工資不均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堅尼系數計量某一國家內，收入分布偏離完全均等分布的程度。50百分位數與10百分位數的比率即對比50百分位數與10百分位數的每月工資。90百分位數與50百分位數的比率即對比90百分位數與50百分位數的每月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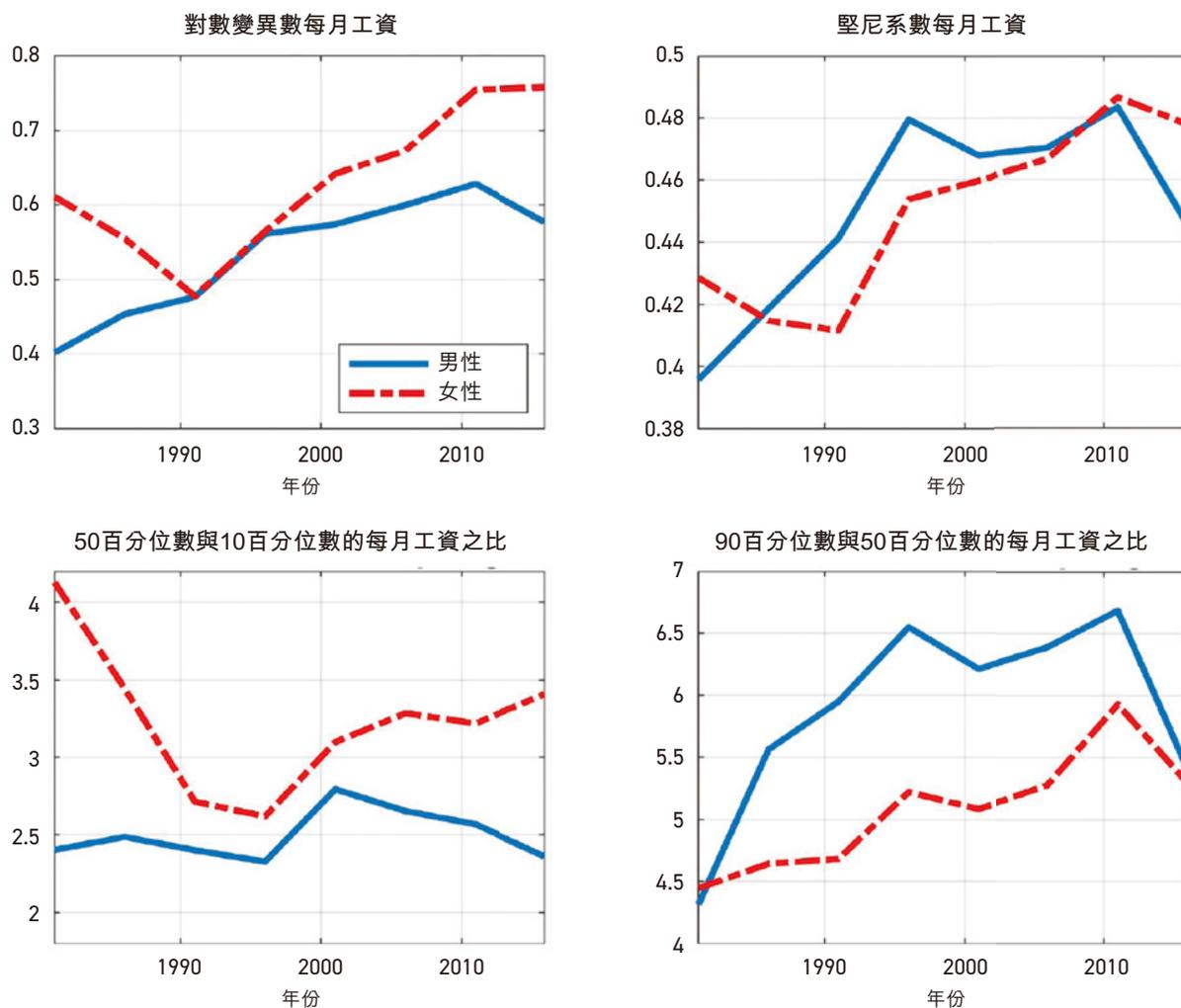


圖2 兩性平等趨勢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性別工資差距指女性平均月薪與男性平均月薪之比。就業份額指就業女性與就業男性在總就業人口中的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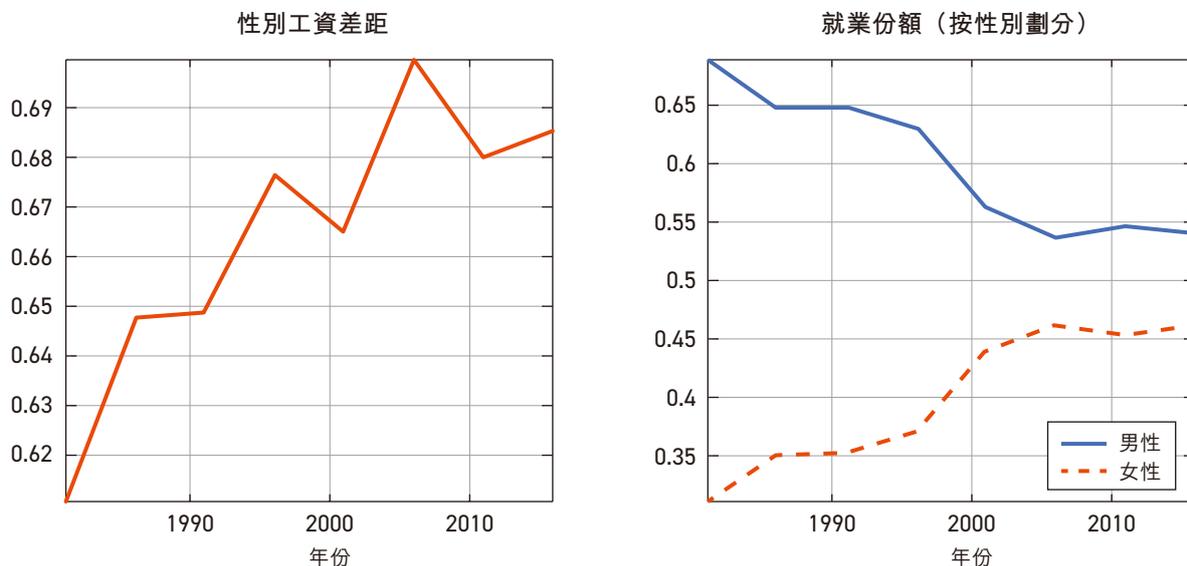


圖3 技能溢酬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左圖包括所有樣本，而右圖則將樣本分為5個年齡組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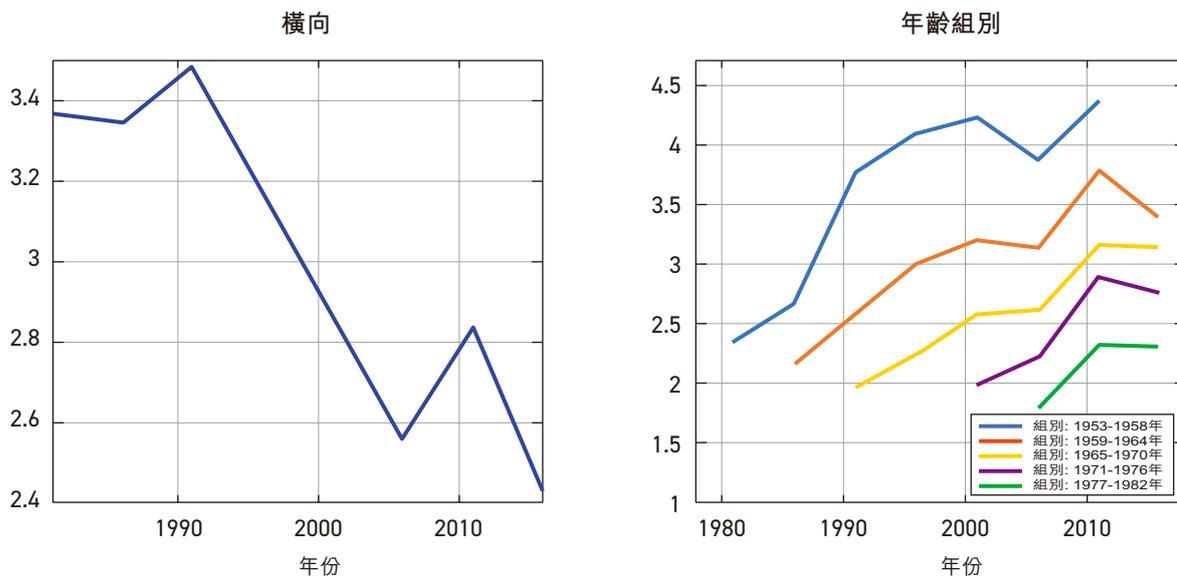


圖4 各年齡組別中高教育程度就業者的佔比

註：X軸代表1926至1988年出生的年齡組別。Y軸代表大學畢業就業者人數與各年齡組別的總就業人口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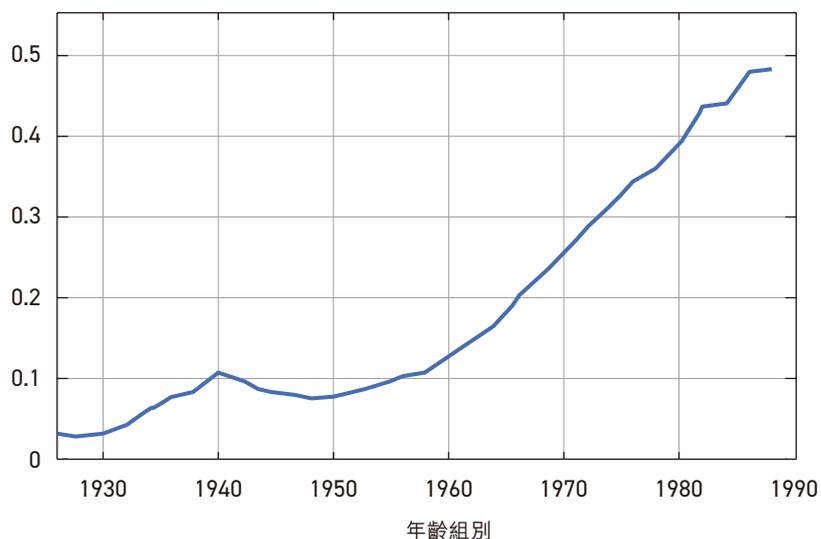


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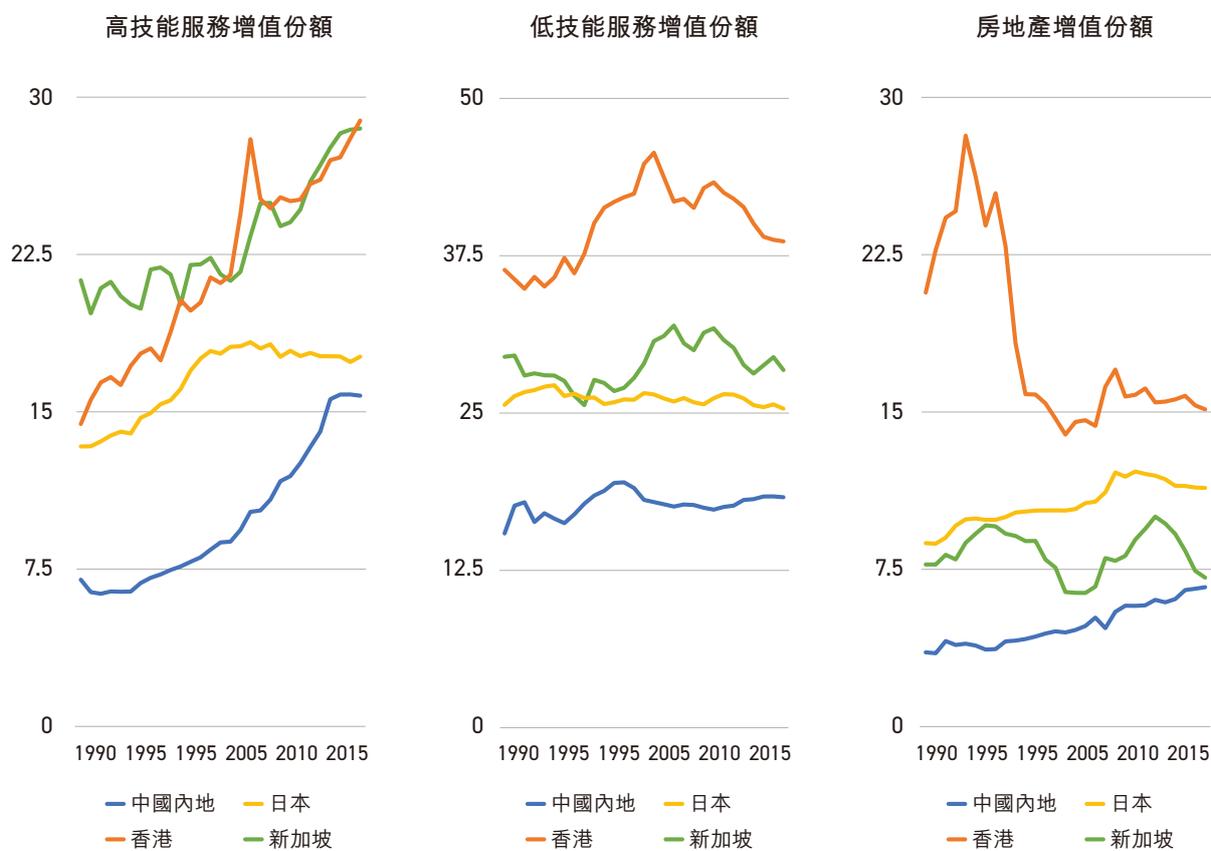


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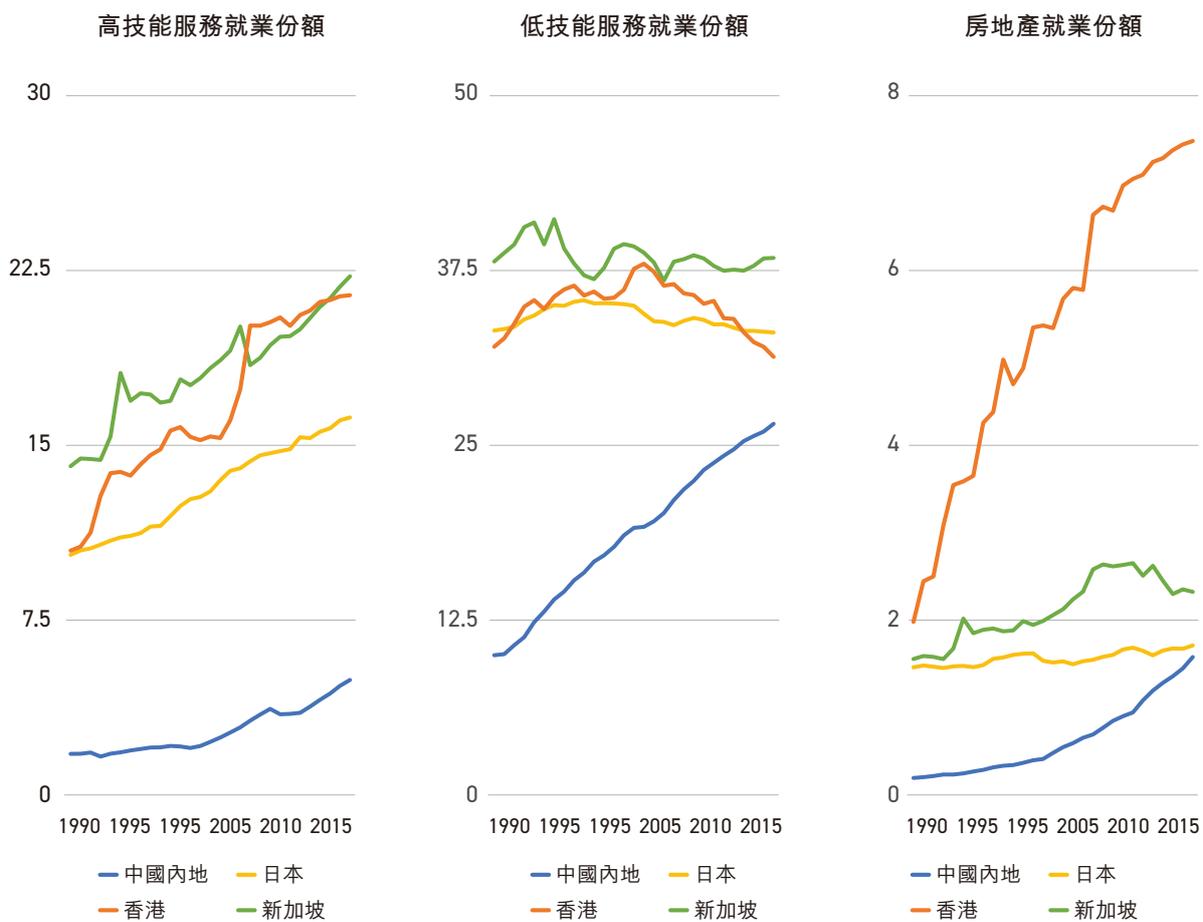


圖7 住戶收入分布演變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住戶收入指每一住戶中所有成員每年收入總和。圖中各線代表按收入百分位數劃分並於1981年標準化至0的平均住戶收入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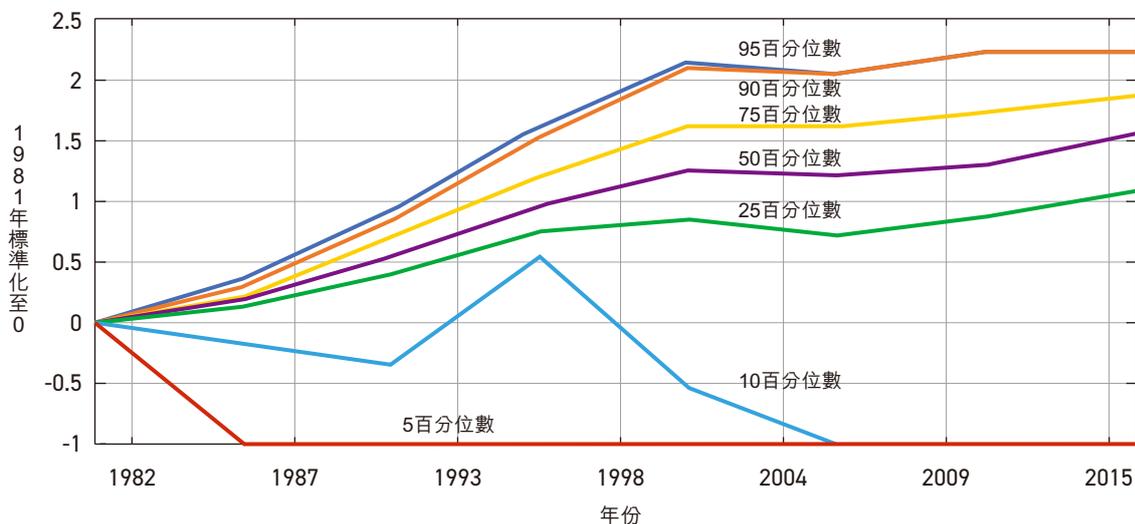


圖8 住戶收入不均對照稅前收入不均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9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的比率即對比9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的住戶收入/稅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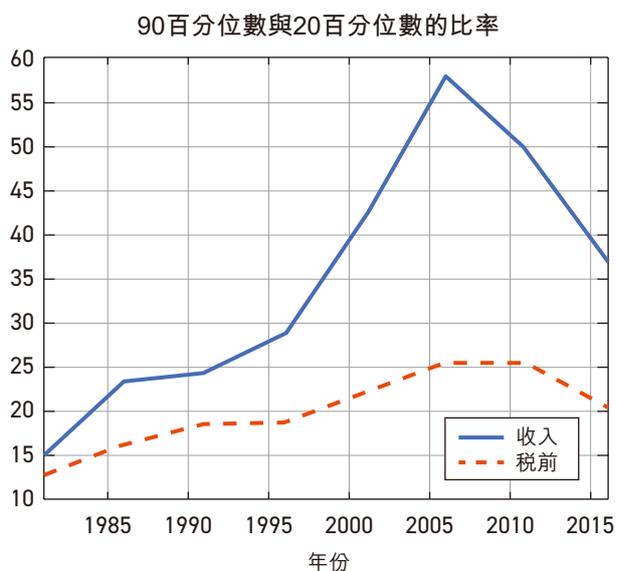


圖9 住戶收入不均對照稅前收入不均(頂層與底層)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5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的比率即對比50百分位數與20百分位數的住戶收入/稅前收入。90百分位數與50百分位數的比率定義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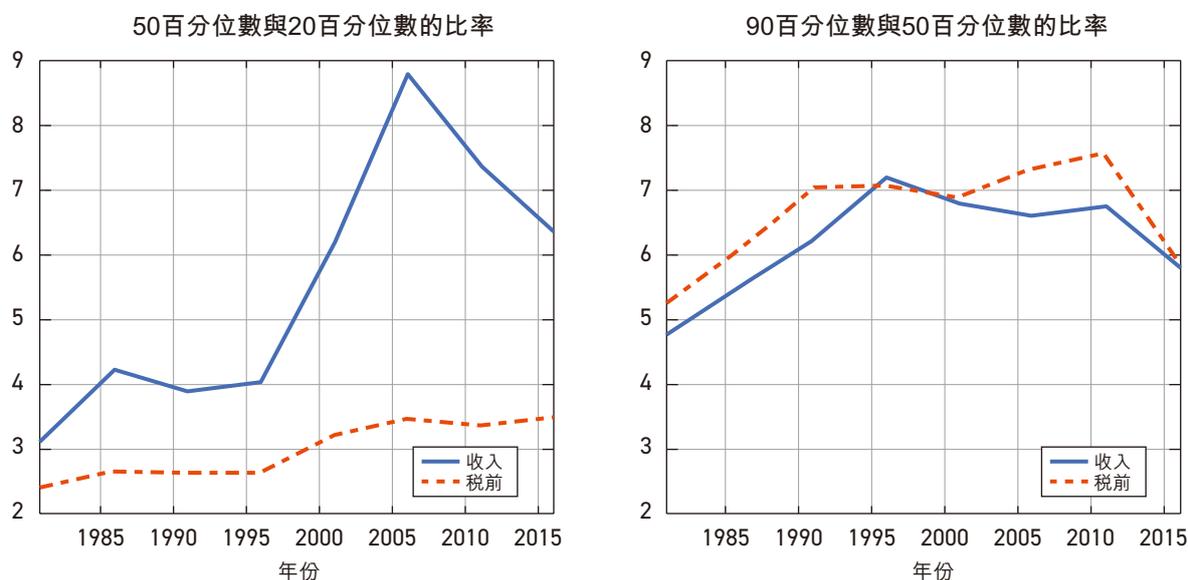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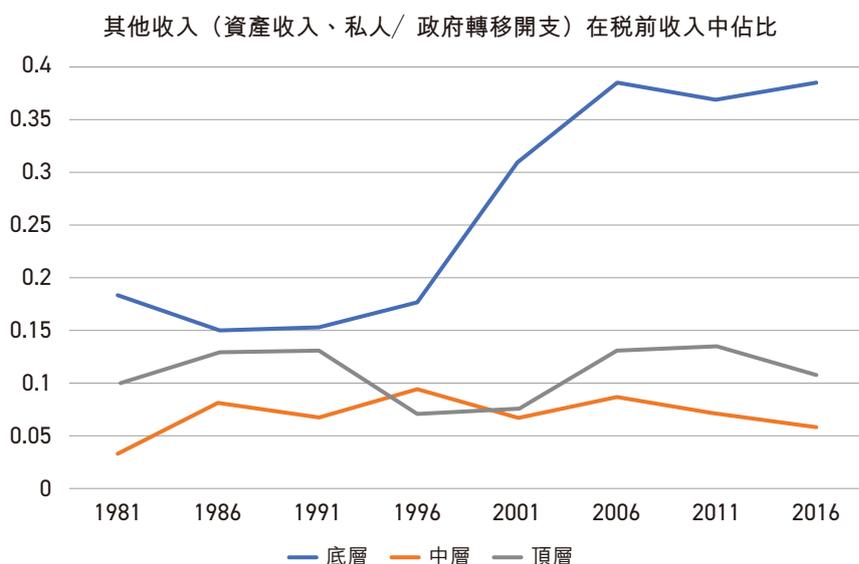


圖10 政府轉移開支分布

註：X軸代表1981至2016年調查年份。Y軸代表住戶稅前收入中其他收入的平均百分比。





人口老齡化 對香港未來 醫療衛生開支 的影響分析

人口老齡化對香港未來醫療衛生開支的影響分析

David Bishai (貝大為)*

陳禧音*

Karen Grépin

全劍超

* 共同第一作者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摘要

目標：近期，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高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儘管如此，特區政府一直維持50%的歷史醫療衛生開支份額，自費和保險基金分別佔30%和20%。本文量化了2023至2040年人口老齡化對未來醫療衛生總開支的影響。同時，筆者按住院醫療護理、門診醫療護理、日間醫療護理、醫療物品和長期護理方面，將預測的醫療衛生開支增長加以分項。

方法：根據60歲以上人口比例、人均GDP和醫療通脹率，將過去23年來的人均醫療衛生開支資料建立時間序列模型。採用最佳擬合的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ARIMA)模型來預測直至2040年的醫療衛生開支總額及其分項支出額。

結果：2010年起，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在2010年開始超過GDP，2023年更是GDP增速的兩倍。如果外來移民有助於減慢人口老齡化，則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將在2028年與GDP增速持平。在所有情景中，醫療衛生開支在GDP的佔比都將從目前的7%升至9%；而長期護理的增速將成為醫療衛生開支各分項中增長最快的部分。

討論：在未來的5年裡，香港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預計將持續高於GDP的增長速度，進一步擴大醫療衛生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政府可推行的積極有為措施包括：提高醫院管理局醫療服務的效率；通過更好的人口公共衛生計劃提高衛生署預防疾病的能力；通過新的公共收入來源增加財政空間以趕上需求；以及使醫療保險市場成為公共系統更有效的減壓閥。香港對改革躊躇不決的時間愈長，難度就愈大。因此，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商討醫療衛生體系的最佳方案，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不斷增長的醫療衛生開支，同時避免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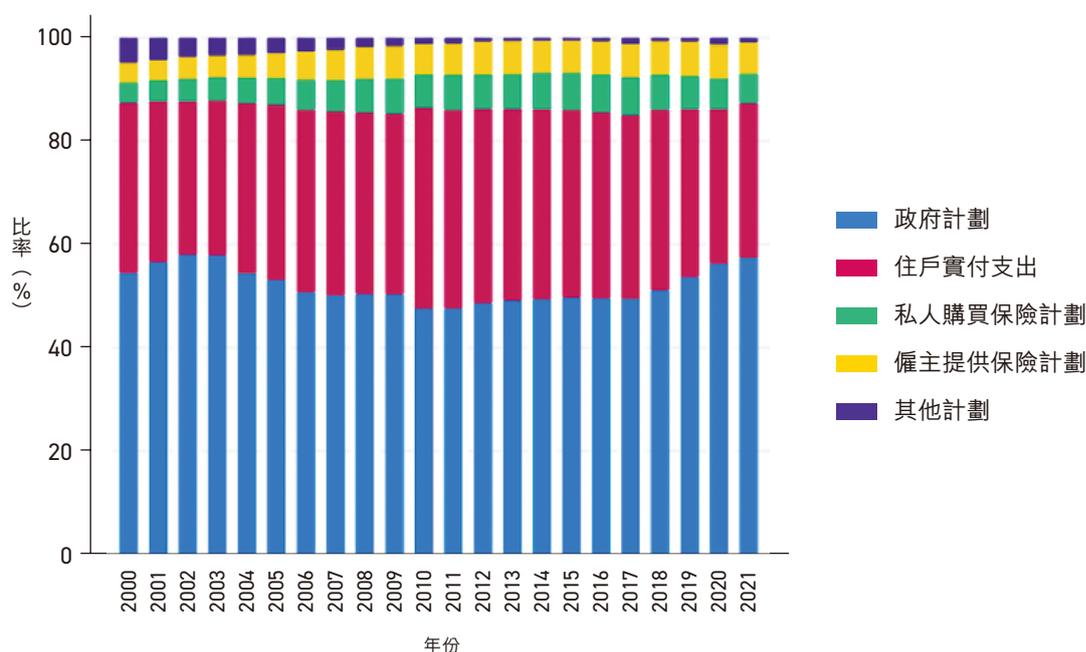
一、引言

1990至2020年期間，香港醫療衛生總開支的年均增長率為5.6%，而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僅為3.4%。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更不斷加快，在2017至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3年期間，醫療衛生開支增長率分別為6%、6.5%和6.9%。人口老齡化、醫療物品成本上漲、患病率增加、醫療強度提高是醫療衛生開支上升的根本原因。在香港，人口老齡化是勢將推高醫療衛生開支的首要因素。在應對新醫療物品價格上漲、預防疾病、提高醫療的成本效益方面，香港尚須加倍努力。為應付不斷增加的醫療開支籌資的困局早在20年前就已迫在眉睫，時至今日，人口老齡化難關當前，醫療經費問題變得更大，也更難解決。

2022年，65歲及以上的長者共159萬人，佔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預計至2036年將達241萬，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3)；(香港特區醫院管理局2022)。無可避免，隨着長者人口增加，其所需醫療服務會愈加增多。例如，雖然目前長者只佔總人口的20%，但卻佔所有住院日和住院人數的一半(香港特區醫院管理局2022)。從過去長者使用醫療衛生服務的趨勢來看，此一範疇的未來開支只會有增無已。加上新藥物和新療法的出現，醫療衛生服務的價格勢將上漲。醫療保健新技術絕少能節約成本(Chernew 與 Newhouse 2011)。再者，治療強度的變化也導致成本增加，皆因愈來愈多針對不同疾病的治療方案可供選擇，醫生為病人進行的治療自然更多。

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醫療衛生開支的增幅較GDP為高(Farag, NandaKumar et al. 2012)，以致收入增幅往往只與GDP相等的政府備受壓力。2019/2020年度，香港的醫療衛生開支總額為1,890億港元，佔GDP的6.8%。在7,310億港元的政府總開支中，公共醫療衛生開支的比例為54%，總值達1,020億港元。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以來，政府一直承擔公共醫療衛生開支，維持在全港醫療衛生總支出的48%至54%(香港特區醫務衛生局2023)【圖1】。儘管近年來有超過100萬市民購買了各類自願醫療保險計劃，如圖所示，其在整體開支中的份額並未見顯著增加。

圖1 2000-2021年香港各種醫療融資來源比率



預計未來幾十年，香港人口老齡化將給醫療衛生系統帶來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本文對香港2023到2040年期間的醫療衛生開支提出新的預測，以協助政策制定者規劃如何持續提供高質量服務和財政保障。筆者的分析數據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和醫務衛生局公布的2000至202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

二、研究方法

差分自回歸移動平均 (ARIMA) 模型被廣泛用於預測醫療衛生開支 (Getzen 與 Poullier 1992；Klazoglou 與 Dritsakis 2018；Zheng, Fang et al. 2020)。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只需要最少的假設，因為它們只利用了過去的總開支資料來預測未來的總開支¹。筆者使用了未經調整的基線模型，以及調整人口老齡化、醫療通脹率和 GDP 增長後的模型。

1 另一種精算方法 (本研究並未使用) 是按年齡、性別、疾病、每種疾病的住院/門診病人次數和每次發病的費用對醫療衛生開支進行分類 (Wanless 2002；Leung, Tin et al. 2007)。該精算方法採用關於未來醫療價格、疾病發病率、住院率和人口規模的多種隱性假設。

(一) 基線模型

本研究的基線 ARIMA 模型將價格、疾病和人口老齡化因素綜合考慮，因此假定未來的總體模式與過去的總體模式相似。正如附錄中的相關討論，筆者首先評估某一年的醫療開支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幾年的開支和隨機衝擊²，然後利用 2000 至 2022 年數據擬合了以下的簡單模型：

$$[1] H_t = C + \beta_1 T + (\gamma_1 H_{t-1} + \gamma_2 H_{t-2} + \gamma_3 \varepsilon_t + \gamma_4 \varepsilon_{t-1} + \gamma_5 \varepsilon_{t-2})$$

其中， H_t 是 t 時間內的醫療衛生開支總額， T 代表時間（以年為單位）。為了校正某一年的醫療衛生開支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過去的開支，筆者根據 Akaike 資訊準則 (AIC) 加入括號中的項。在 β 確定之後，就可以根據 $H_t = C + \beta_1 T$ 來預測 2023 至 2040 年 T 的預測估計值。

(二) 人口老齡化調整模型

人口老齡化調整模型在公式【1】的基礎上，同時調整了過去 60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PP60) 的數據。在這種情況下，預測估計值等於 $H_t = C + \beta_1 T + \beta_2 PP60_{t+}$ 。這也要求對未來的 PP60($t+$) 進行人口預測；統計處估計，假使香港在數十年內能實現每年淨遷入約 5 萬名年輕居民，則 60 歲以上人口將在 2030 年停止上升。

(三) GDP 及醫療通脹率調整模型

GDP 及醫療通脹率調整模型在公式【1】的基礎上，調整了過去 60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PP60)，以及過去 GDP 和醫療平減物價指數的數據。該模型的預測估計值基於每年 2.41% 的 GDP 增長率（相當於 2000 至 2022 年期間香港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及 4.67% 的醫療通脹率（根據 2000 至 2020 年的醫療通脹率）。

2 當開支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1 年、2 年、3 年……之前的開支模式，就被稱為「自回歸」，背後原因是多年期勞動合同和資本融資。某一年的沖擊影響到隨後幾年的開支之際，開支模式被稱為「移動平均」；例如，由於煙草相關疾病、愛滋病或肝炎等流行病造成的持久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 使用數據摘要

表 使用數據說明

	觀測值	平均數(標準差)/中位數(四分位距)
年份(年)	23	2021 (11)
60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23	20% (12.56)
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現值美元)	23	\$35,868 (9159.91)
人均醫療衛生開支(現值美元)	23	\$2,068 (851.84)
醫療通脹率(%)	20	4.67 (2.05)

(二) 主要結果

【圖2】比較基線模型【1】預測的未經調整的現值美元醫療衛生開支(藍色虛線)和根據60歲以上人口比重調整的現值美元醫療衛生開支(藍色實線)。作為參考，香港的GDP趨勢基於2.41%的經濟增長率預測，以紅色實線表示。從2022年起，未經調整的醫療衛生開支呈線性向上趨勢，2020年的醫療衛生開支是基線年份(2000年)的3倍，到2040年將增至5倍以上。根據統計處預測的人口老齡化放緩情況進行調整後，醫療衛生開支在2040年只會增至基線年份的4倍。

與這兩種模型估計的醫療衛生開支相比，假設GDP繼續以2.41%的速度增長，到2040年也只會接近基線年份(2000年)醫療衛生開支的3倍。【圖3】比較【圖2】中曲線的斜率，顯示隨着老齡化減緩，2028年後醫療衛生開支的增幅勢將放緩。未來人口結構的預測數據來自統計處，即香港在未來幾十年每年足以輸入大約5萬個年輕淨移民，這將減低60歲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幅³。

3 根據當局估計，2021-2026年、2026-2031年、2031-2036年和2036-2041年期間，2.6至2.7人的家庭住戶將分別淨增106,000戶、104,600戶、89,700戶和68,300戶(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3)。

【圖4】顯示2000至2042年的42年間醫療衛生開支佔香港GDP百分比的變化趨勢。根據未經調整的基線模型，醫療衛生開支佔GDP的比例預計將從2020年的7%擴至2040年的9%以上。然而，基於來港的人口變化加以調整後，儘管醫療衛生開支在2032年左右達到近8%的峰值，但到2040年，此一份額將跌至大約7.5%。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相關因素對醫療衛生開支的增幅可產生減緩作用。

附錄2臚列預測醫療衛生開支各分項的模型。從附錄【圖2.1】中可見，在2000年和2020年，最大的醫療衛生開支組成部分是門診醫療護理、住院醫療護理、日間醫療護理、醫療物品和長期護理。到2040年，各分項相對比率預計將保持不變。如附錄【圖2.2】所示，長期護理在5個主要分項中增長最快，從2020年6倍於基線年份(2000年)以上增至2040年約12倍於基線年份。日間醫療護理是增長第二快的開支分項，將於2040年增至近9倍於基線年份。值得一提的是，從2020到2022年，預防護理分項達到峰值，約為基線年份的10倍，這可歸因於新冠疫情的爆發，令其成為期間增長最快的醫療開支分項。為確保穩健性，筆者發現ARIMA基線模型即使經過GDP及醫療通脹率調整，本研究的預測結果並無多大改變。這是因為醫療通脹和GDP對醫療衛生開支的效應已經包含在2000至2020年醫療衛生開支變量的增長模式中(附錄1)。

圖2 2000-2042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化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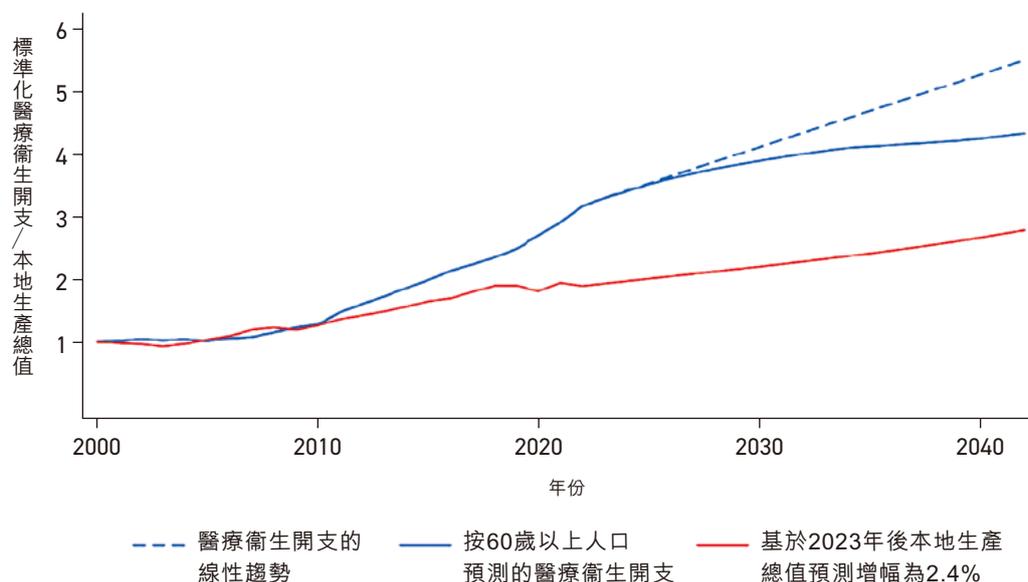


圖3 2023-2042年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增幅的預測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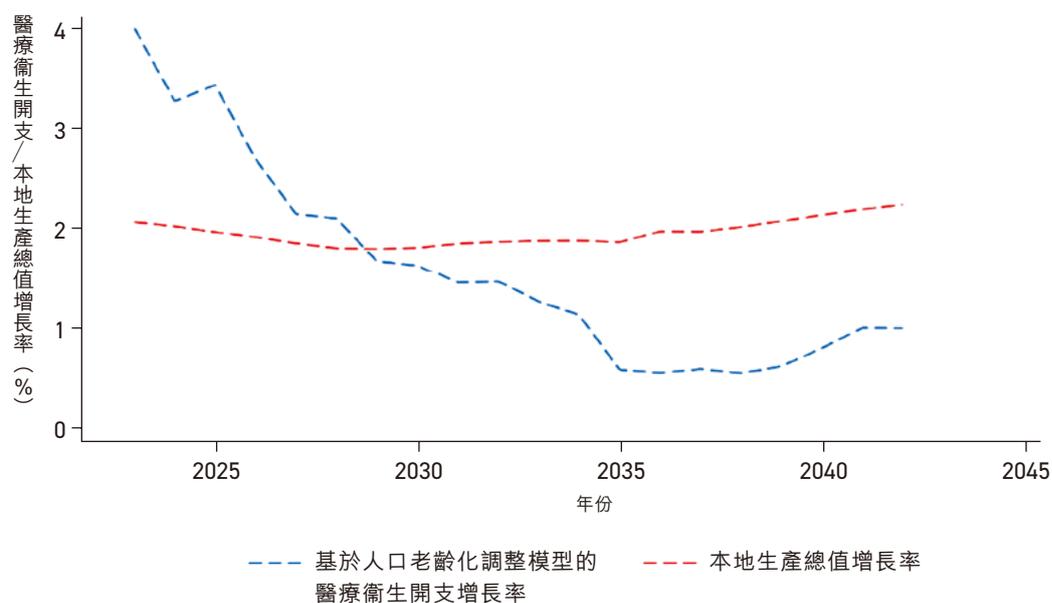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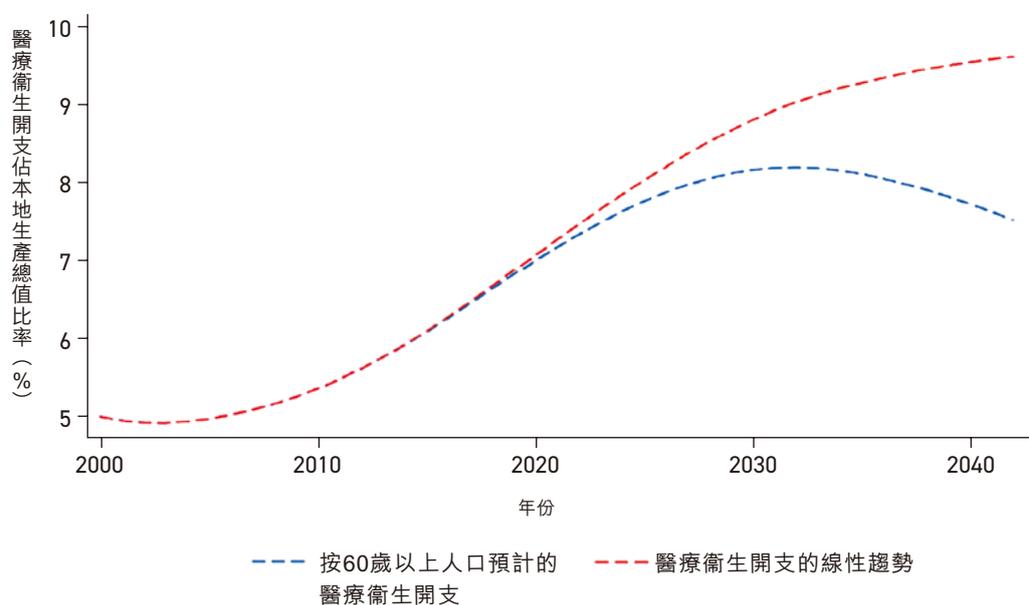


圖4 2000-2042年醫療衛生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的預測趨勢



四、結論與建議

香港醫療衛生開支未來的增長趨勢將使特區政府財政日益受壓。至少直至2028年，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速度將超過GDP的增長速度。香港若能在10年內實現每年淨流入約5萬個年輕居民估計醫療衛生開支佔GDP份額的升幅在2040年得以放緩，下降到7%水平。否則，在缺乏外來移民抵消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效應下，此一比例將於2040年升至9%。

對於醫療衛生體系的改善方案，各界議論多時，但一直未能大肆改革。解決方案必須涵蓋多方面，其中主要包括：一、加大投資力度，通過疾病預防、健康推廣和全面基層醫療以免市民染病入院之需；二、通過供求控制，提高現有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三、對新藥物和新技术的引入和定價善加管理；四、協助市民計劃和支付適合其文化背景的長期護理；五、推動整體醫療保險市場在醫療融資方面發揮更大作用⁴；六、通過抵押收入或社會保險為政府融資開源 (Leung 與 Bacon-Stone-J 2006)。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療衛生開支的增長將持續超出特區政府所能負擔的水平。基於醫療衛生開支擴大主要由老齡化帶動，因此公共醫療部門出現的實際情況在於入院人數、住院日數和門診次數隨長者對醫療服務需求趨升而有所增加，以致捉襟見肘的公營醫護人員窮於應付。本來就很長的公共醫療服務輪候時間恐怕只會愈來愈長。香港在人口健康指標 (如嬰兒夭折率低、預期壽命長等) 各方面的出色表現，勢難維持。至於上述改革中哪些最適合香港，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是項研究的結果旨在喚醒各界關注醫療衛生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除非能及時進一步採取應對措施，否則日益嚴峻的情況只會繼續惡化。

參考文獻

Chernew, M. E. and J. P. Newhouse (2011). Health care spending growth.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Elsevier. 2: pp.1-43.

Farang, M., A. NandaKumar, S. Wallack, D. Hodgkin, G. Gaumer and C. Erbil (2012).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health care spending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economics 12(2): pp.145-162.

Fishkin, J. S., R. C. Luskin and R. Jowell (2000). "Deliberative polling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Parliamentary affairs 53(4): pp.657-666.

Getzen, T. E. and J.-P. Poullier (1992). "International health spending forecasts: Concepts and evalua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4(9): pp.1057-1068.

4 雖然香港私營保險市場的投保人數增加，卻沒有承擔更大的醫療衛生開支份額(【圖1】)。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3). "Hong Kong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2022-2046." Retrieved November 23, 2023, 2023. <https://www.censtatd.gov.hk/en/scode190.html>

Hong Kong Government (2021). 2020-2021 Budget. Hong Kong.

Hong Kong Health Bureau. (2023). "Domestic Health Accounts." from https://www.healthbureau.gov.hk/statistics/en/dha/dha_summary_report.htm.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 (2022). Strategic Plan 2022-2027. Hong Kong.

Hsiao, W. and W. Yip (1999). Improving Hong Kong's healthcare system: why and for whom?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Klazoglou, P. and N. Dritsakis (2018).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of US Health Expenditures Using ARIMA Model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eung, G. M. and Bacon-Stone-J (2006). Health Financing Reform. Hong Kong' Health Syste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339-396.

Leung, G. M., K. Y. Tin and W.-S. Chan (2007). "Hong Kong's health spending projections through 2033." Health Policy 81(1): pp.93-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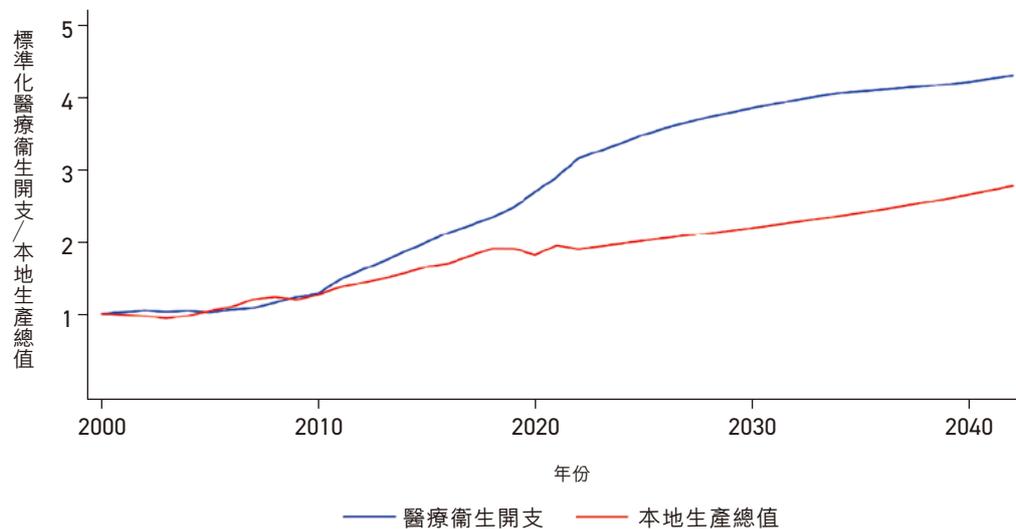
Wanless, D. (2002). Securing our future health: taking a long-term view. C. o. t. Exchequer. London.

Zheng, A., Q. Fang, Y. Zhu, C. Jiang, F. Jin and X. Wang (2020). "An application of ARIMA model for predicting total health expenditure in China from 1978-2022." J Glob Health 10(1): 010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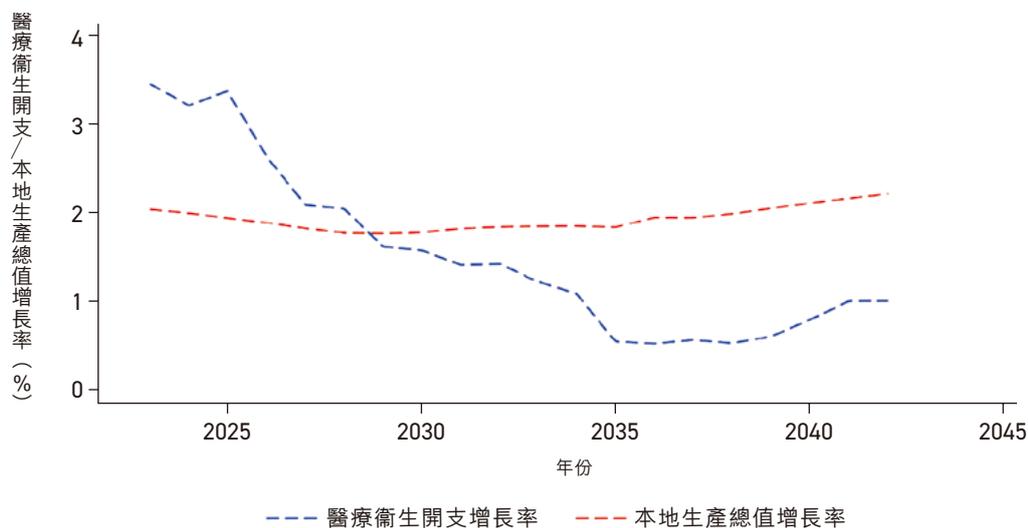


附錄 1 敏感性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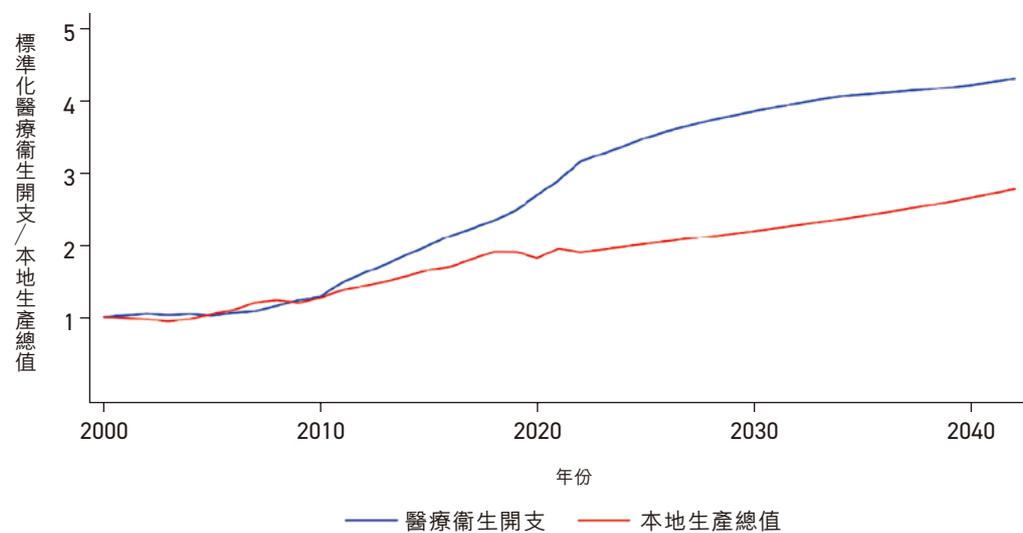
附圖 1.1 2000-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化趨勢
(本地生產總值調整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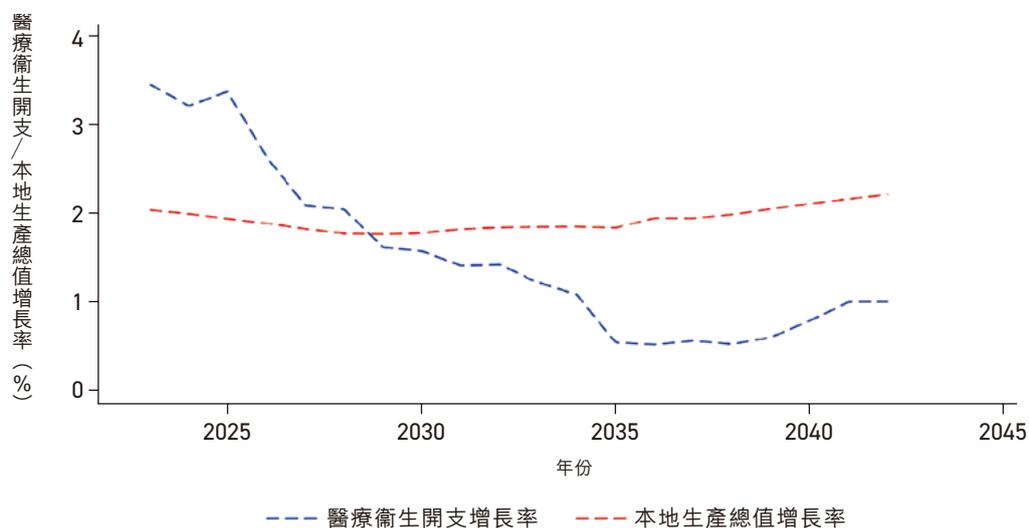
附圖 1.2 2023-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本地生產總值調整模型)



附圖 1.3 2000-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化趨勢
(本地生產總值及醫療通脹率調整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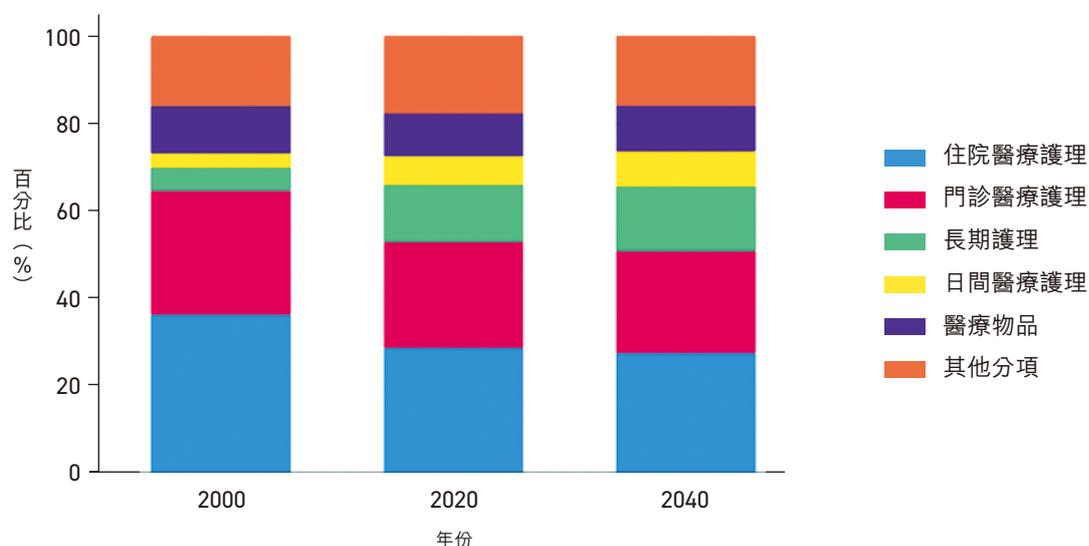


附圖 1.4 2023-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和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本地生產總值及醫療通脹率調整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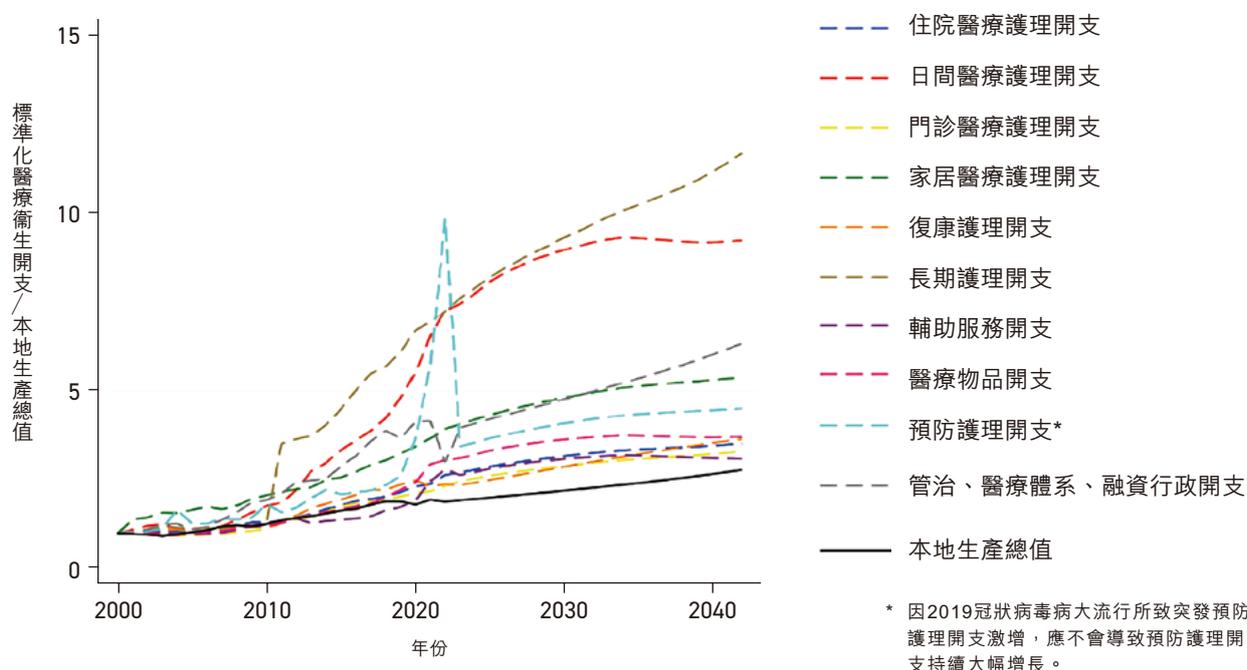


附錄 2 過去、現在、未來的醫療衛生開支分項份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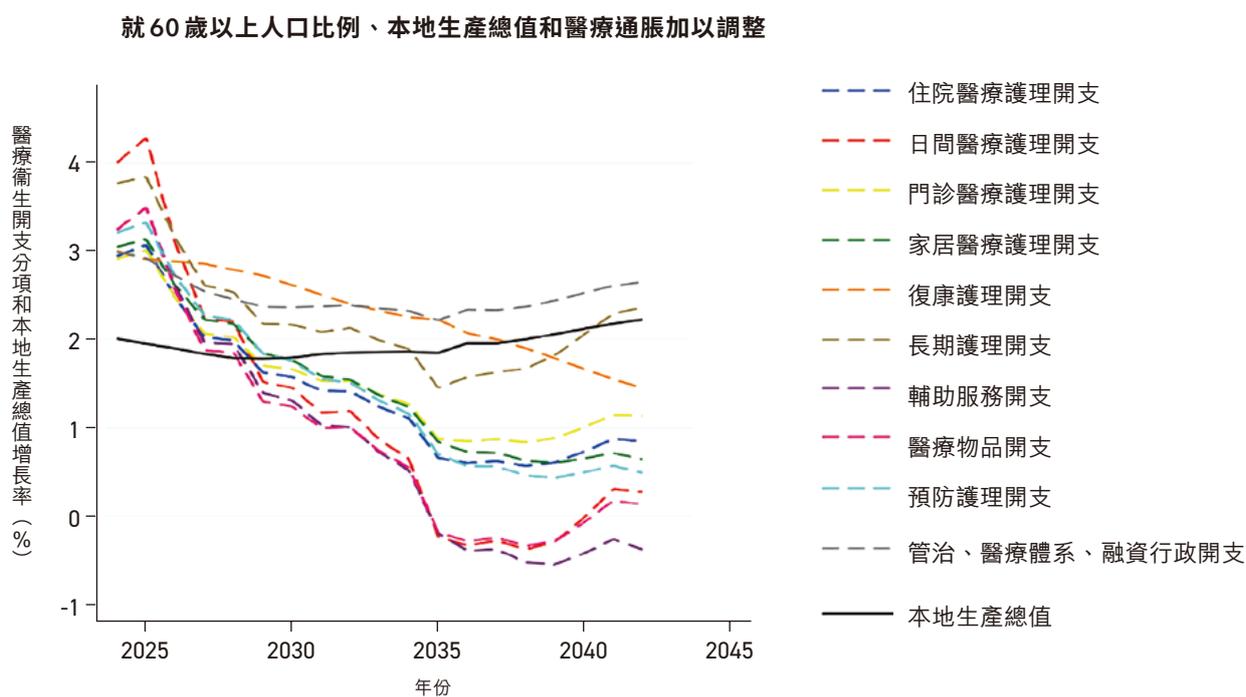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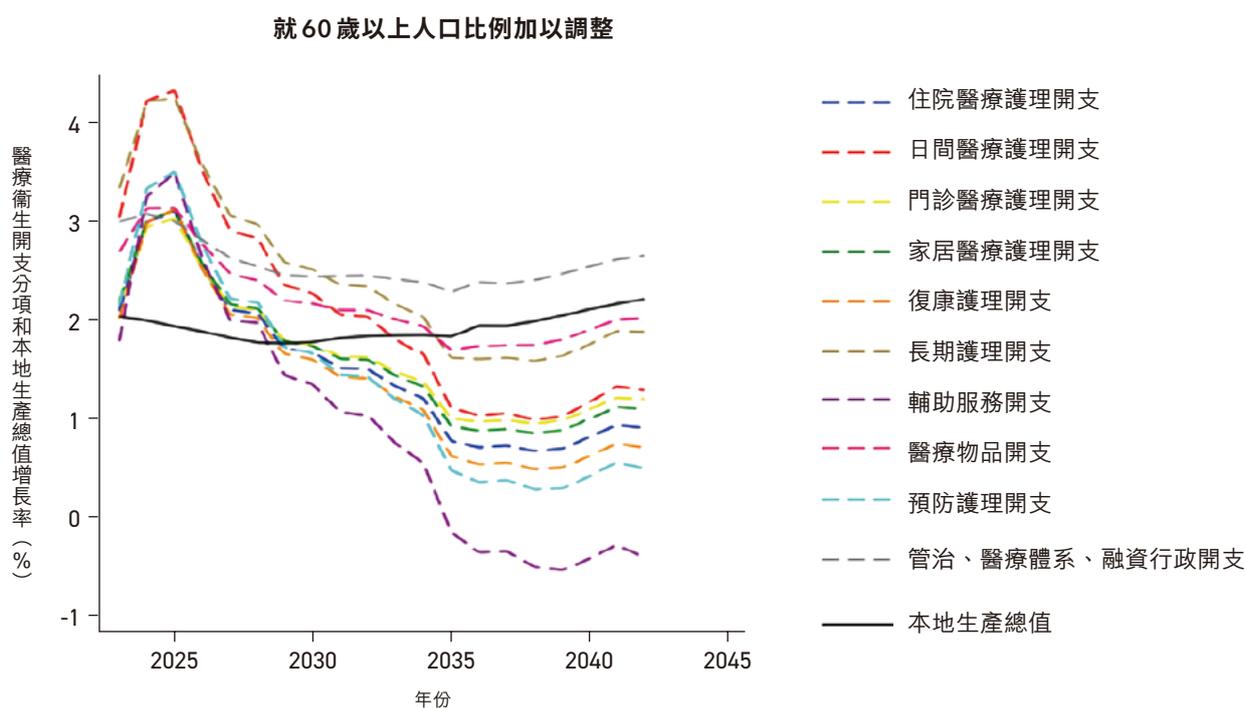
附圖 2.1 2000 年、2020 年、2040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分項所佔份額



附圖 2.2 2000-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分項和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化趨勢



附圖 2.3 2023-2042 年香港醫療衛生開支分項和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趨勢



附錄3 實證分析方法論

另一種精算方法(本研究並未採用)是按年齡、性別、使用情況和每次診金對人口加以細分(Wanless 2002 ; Leung, Tin et al. 2007)。人口的總開支模型為以下乘積：

$$[1] \text{ 總成本} = \sum (N_{jt}) \times (D_{jkt}) \times (M_{jkt}) \times (C_{ijkt})$$

其中， N_{jt} 是年齡組別和性別組別的人數。 D_{jkt} 第 j 組中 k 型疾病的發病次數。 M_{jk} 是第 j 組中 k 型疾病的 i 型治療次數。 C_{ijkt} 是治療 i 在時間 t 的成本。該方法的缺點是需要對不同年齡、疾病和治療類型的 N 、 D 、 M 和 C 的未來趨勢進行數十次單獨預測。過去的成本、疾病趨勢和治療趨勢數據庫往往有限，因此分析人員必須作出許多假設，而大大增加預測的不確定性。

至於本研究所採用的ARIMA方法，則假定總開支的過去趨勢匯總了發病率、使用率和通脹率過去趨勢的所有相關資料。

模型擬合的統計方法

基線模型分析已先包含年度趨勢，並以人口老齡化作為評估考慮因素。在敏感性分析中，更納入GDP以及GDP與醫療通脹率相結合等附加預測因素。本研究也採用了折線圖，以示從2023年起醫療衛生開支和GDP增長率的時間演進，以及2000至2042年42年間醫療衛生開支和GDP的標準化趨勢。筆者亦使用經擴張的Dickey-Fuller檢驗來評估總醫療衛生開支及其分項的平穩性。根據所報告的AIC，在每個ARIMA模型中選擇最合適的自回歸(AR)和移動平均(MA)滯後數。筆者的ARIMA模型方程概述如下：

$$[2] H_t = C + \beta_1 T + \beta_2 Pop60_t + \beta_3 GDP_t + \beta_4 MI_t + (\gamma_1 H_{t-1} + \gamma_2 H_{t-2} \dots + \varepsilon_t + \gamma_3 \varepsilon_{t-1} + \gamma_4 \varepsilon_{t-2} \dots)$$

其中， H_t 為時間 t 的醫療衛生開支， ε_t 為開支時間序列的誤差項， γ_1 、 γ_2 為滯後項的自回歸參數， γ_3 、 γ_4 為滯後誤差項的移動平均參數， β_1 、 β_2 、 β_3 、 β_4 分別為時間、60歲以上人口比例、GDP和醫療通脹率等自變量的偏回歸系數。

數據來源

用於訓練模型的數據集包括2000至2022年期間的總人口數目(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3)、60歲以上人口比例(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3)、以當時市價計算的GDP(香港特區政府2021)以及固定(2019年)醫療衛生開支總值(醫務衛生局2023)。本研究還預測了醫療衛生開支的各分項：住院醫療護理、門診醫療護理、日間醫療護理、醫療物品和長期護理等。在各情況中，筆者都會確定最合適的ARIMA模型，再將模型配合60歲以上人口比例以及當時GDP，然後基於60歲以上人口比例和GDP的推算數字來預測未來趨勢。為求穩健性，還依據香港以往醫療通脹率來評估各個模型。為透過以往趨勢預測未來，研究使用了統計處2023至2042年期間60歲以上人口預測的二次項插值法。再者，筆者測試了模型的敏感性，即根據過去23年平均2.41%的GDP年增幅，加以延伸至未來20年，從而對經濟前景進行簡單預測。



利用數據和 算法減低 公屋輪候 時間

利用數據和算法減低公屋輪候時間

王欣儀(賓州大學) 黃美施(賓州大學) 王柏林

平均公屋等候時間從2010年的兩年劇增到今年9月的5.6年。因此，很多低收入家庭入住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被迫忍受擁擠惡劣的居住環境。作為應對之法，特區政府推出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資助計劃，旨在從速為輪候租住公屋者構建可負擔的住屋選擇。

然而，在新界的過渡性房屋出現使用不足的情況；政府又能否在2049年之前取締劏房，同樣令人顧慮。應付此等挑戰必須制定全面而有效的方法，在化解房屋危機之餘，同時提升本港弱勢社群的居住條件。本文建議採用數據分析和電腦算法，通過提高過渡性房屋的使用率，來減低公屋輪候時間。

過渡性房屋計劃棘手問題：使用率低

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分別在2018年和2022年推出，為弱勢家庭提供短期房屋援助，對象主要是公屋輪候名冊登記者及居於劏房者。¹ 預期在2023年及2024年將分別有8,420個及5,54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落成。² 未來5年內則將有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落成，其中有2,100個在2024至2025年度落成。這兩類房屋選址大多位於新界較偏遠地區，例如元朗和上水。³

另一方面，觀察員和分析家卻日益關注選址新界的這兩類房屋，其使用率勢將偏低。政府則指出，位於新界的有關房屋項目平均入住率接近7成，至於市區或鄰近公共運輸交

1 截至2022年底，輪候公屋的一般申請者共約133,700名；全港劏房單位共約107,000個，住客人數約為214,000。

2 6,96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在2020至21年度落成。

3 已公布的簡約公屋項目選址兩個在屯門，一個在上水，一個在元朗。

通樞紐的項目，平均入住率更超過9成。例如據《南華早報》報導，2022年11月，元朗同心村空置單位高達800個(單位總數為1,800個)。日後位於新界的過渡性房屋新項目，選址將比區內現有項目更偏離交通網絡，其入住率或會每況愈下。

空置單位財政成本高昂。特區政府對每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資助金額如下：一、每個位於空置住宅樓宇內的單位可達200,000元，二、在空置土地上及非住宅樓宇中搭建臨時建築物，每個單位可達550,000元。⁴若無法協助居民遷出劏房，將令市區貧困家庭所付租金上漲，而生活水平則下降。下文將探討過渡性房屋計劃在執行上的困難，並建議改善政策設計的措施。

過渡性房屋使用率為何偏低？

原因一：居民與房屋之間的地域錯配

劏房一般位於市區，就業機會處處。遷居新界就會令舉家與原來的生活圈分割；搬遷代價包括：1) 距離職場較遠；⁵ 2) 子女轉校困難；3) 脫離原有社交網絡。

原因二：申請手續繁複

參照過渡性房屋的模式，簡約公屋項目亦交由獲邀機構營運、管理和維修。每家營運機構根據政府所定準則編配單位、處理租務事宜、執行租戶遷出計劃、按個別租戶的需要提供社會服務支援。⁶申請者就不同項目各自提出申請，營運機構無從得知申請者已申請的其他項目及其住屋選擇。申請者可拒絕接受所獲分配的單位，次數不限，亦可就日後較佳的項目提出申請。各營運機構以非統一方式編配過渡性房屋單位。

為應對上述問題，政府近期已開始提供搬遷費津貼，並著手建立統一申請系統。雖然有關舉措值得嘉許，但現行配對程序並未優化。即使寧選位於新界的項目單位而不願租住現有劏房，申請者或仍會選擇輪候較佳的公屋單位。筆者認為，必須針對使用率不足的情況，進一步調整有關資助計劃。

4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4/18/P2019041800367.htm?fontSize=1>

5 2016年，租住劏房的低收入人口中，在其居住地區就業者佔42.2%。參看：<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18/P2018011800590.htm?fontSize=>

6 參看：<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221205cb1-847-1-c.pdf>

市場機制設計：諾獎得主高見

要改善過渡性房屋分配和使用，筆者參考 Alvin Roth 的市場機制設計，其開創性研究在 2012 年為他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箇中基本概念在於搜集每個人從一組既定選項所選擇的次序，然後運用電腦算法產生配對，從而優化整體效用。以選擇居住地區次序各異的過渡性房屋申請者為例，若把各自的優先次序遞交至統一系統，即可利用電腦算法推進配對程序。

近年來，通過採取電腦算法，不同領域的編配工作都能加以優化，例如醫生分派到不同醫院，學生編排在不同學校就讀，病人輪候腎臟移植等。一個極佳的實例就是美國紐約市運用經優化的電腦算法，令學生的派位程序大大改善。《紐約時報》曾經報導，未能獲派所選學校的學生，由 2003 年修訂有關電腦算法前的 31,000 名減至 2004 年修訂後約 3,000 名。⁷ 自此之後，有關算法一直令該市接近半數學生得以編派到其首選學校；足證電腦算法有助於優化分配程序，並確保每人獲得最佳成果。

實例闡釋

申請家庭的房屋選擇各有不同，處理申請程序時運用統一電腦算法，就能顯著改善公屋單位的編配、使用和滿意程度。茲列舉以下兩個簡單示例加以說明，其中申請家庭均可按優先次序，選擇位於不同區域的項目單位。

從【圖 1】可見非統一編配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在現行非統一編配機制下，每一申請家庭每次只限遞交一份申請表。若有多個申請戶選擇同一單位，就會出現一些單位空置的現象。例如位於元朗的某項目單位率先落成，卻乏人問津，以致成為空置單位。從圖中可見，反而有多個申請戶選擇輪候深水埗的項目，而結果發現單位超額申請。要剔除如此低效的安排，應先取得申請戶的選擇次序，然後以優化算法處理申請，以徹底消除公屋單位空置及超額申請的弊病。

7 參看：<https://www.nytimes.com/2014/12/07/nyregion/how-game-theory-helped-improve-new-york-city-high-school-application-process.html>

圖1 非統一編配可導致公屋單位空置

	首選	次選	三選
1. 甲家庭	深水埗 ✓	元朗	沙田
2. 乙家庭	沙田 ✓	深水埗	元朗
3. 丙家庭	深水埗 ✗	沙田	元朗

話說回來，即使採取統一編配方式，若只運用基本算法，成果大概仍然有欠理想。【圖2】示例顯示，每區依然只得一個項目單位可供選擇，將按申請戶的各自首選編配到餘下單位。順序算法把甲家庭編配往元朗，乙家庭編配往西貢，丙家庭則編配往沙田。如此算法無疑效率欠佳，因為只得一個家庭獲編配首選單位。較具效益的一種算法是「頂級交易周期」(Top Trading Cycles) (Shapley and Scarf 1974)，可根據申請戶的選擇次序達致較佳編配效果。在此示例中，若把丙家庭編配往西貢，乙家庭編配往元朗，甲家庭則編配往沙田，就可讓兩個申請戶獲編配首選單位。因此，要確保取得最佳成果，就必須對編配機制的特性細加研究。

圖2 優化電腦算法可改善滿意程度

	首選	次選	三選	順序編配	頂級交易周期	
1. 甲家庭	元朗	沙田	...	10	5	
2. 乙家庭	元朗	西貢	...	5	10	
3. 丙家庭	西貢	沙田	...	5	10	
				總計	20	25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房屋局善用數據分析和市場機制設計理論，改善公屋配對，並讓過渡性房屋充分使用。建議措施如下：

所有申請者將有關過渡性房屋項目的選擇次序，交由統一申請系統一併處理。

統一系統隨即透過優化設計的電腦算法，將申請者的選擇次序與營運機構的甄選準則和次序納入其中，以編配項目單位。

可供申請者接納或拒絕的單位編配次數有限，亦即類似出租公營房屋計劃的安排。

在目前嚴格的過渡性房屋配額制度下，8成單位須預留給已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申請戶，但透過本文建議的編配系統，則可作出靈活排序處理，從而盡量減低單位空置率。

以上各項調整措施可同時惠及過渡性房屋申請者及住客。首先，建議制度的電腦算法已納入相對選擇次序，申請者獲編配所選單位的機會因而較大。

其次，由於較佳配對成果更符合申請戶所需，筆者建議的調整措施將有利於提升編配單位的接納比率。限制申請戶取捨單位編配的次數，將可成為申請戶接納新界項目單位而不再輪候市區單位的誘因，由此可擴大過渡性房屋新界項目的單位使用率。

調整措施成本有限

上述建議的政策調整措施只需有限投資，無疑是可行方案。在特區政府所籌備的統一申請系統中增添編配算法，軟件開發所費工夫亦微不足道。

此外，設計統一編配算法的專才不在少數。本地及國際學術研究人員對本港情況素有研究，不失為推行調整措施的寶貴資源。

營運機構仍有權在統一編配單位後作出篩選，把不合適申請者或有潛在問題的租戶剔除，統一系統不會對營運機構造成掣肘。不獲批核的申請者，可重新進入編配算法，以便配對合適的單位。如此安排亦可減輕營運機構的間接行政成本，因為毋須再處理重疊申請。

整體而言，本文建議的政策改動提供具成本效益的實際方法，可促進過渡性房屋的分配和使用，確保各申請者獲編配合適的房屋選擇；同時亦可減輕行政費用，並提升編配程序的效率。

擴大公營房屋制度的效益

筆者的初步建議著眼於改良過渡性房屋計劃，香港可運用數據分析和電腦算法，從更廣闊的層面改善公共房屋供應。公屋租戶和居者有其屋計劃住戶出現地域錯配，比私人住宅市場更為嚴重，Lui 與 Suen (2011) 等學者已對此現象進行大量研究。通過收集對於公屋位置和特色的詳細選擇次序，加上運用電腦算法找出最佳配對，就能在編配單位方面達致更理想成果。這些數據還可以用來衡量其他住房政策的效益，例如允許公屋住戶交換住房單位的有效性。

採納筆者倡議的辦法，決策者就能通過基於數據的單位編配，提升整個公營房屋制度中的分配效率。這種方式能令選擇公屋單位與個別住戶需要互相匹配，從而減少地域錯配問題，並帶來重要福利收益，惠及一大部分香港市民。

參考文獻

Kwan, Shawna. (2021). "Hong Kong Homes Ranked Least Affordable for 11th Year." Bloomberg. Accessed a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2-23/hong-kong-homes-ranked-world-s-least-affordable-for-11th-year> on October 11, 2021.

Lui, Hon Kwong, & Suen, Wing. (2011). The effects of public housing on internal mobility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0(1), 15-29





人才得失與
香港前景：
領英社交資料
佐證

人才得失與香港前景： 領英社交資料佐證

關穎倫 鄧希煒 王柏林



一幅香港維多利亞港靜態水彩畫。一條出水玉龍引領着一眾專業人士，象徵人才流入；另有一條赤龍騰空而起，將專業人士帶往天際，則代表人才流失。雙龍動態各異，凸顯出香江勞工市場的變遷。（圖片來源：DALL-E3）

近年，不論香港特區政府、商界或媒體，對於人才流失的負面社會經濟衝擊，均大表關注。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不諱言，雷厲風行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觸發「無可置疑」的人才流失。因本地政治動盪以及香港居民申請入籍英國的新途徑亦加速了人才外流。這個大前提意味着人力資本流失，帶來不同社會和政策問題並可能損害香港未來的成長。

首先，連串問題油然而生：所謂人才流失，是否真有其事還是誇大的問題？離港他去的一群，是否人力資本最強的人才？遷移者是否大都落戶在亞洲區內的香港勁敵，例如新加坡？人才外流是否經由跨國公司安排？人才流失是否已被人才流入抵消？人才流動對香港的競爭優勢又有何影響？

本文根據專業人士網絡平台 LinkedIn 及特區政府的數據，對香港人口結構和經濟前景的變化作出評估。結果發現香港在面臨人才流失之餘，人才流入量亦甚高。相對於離港人口，來港人口年齡較大，教育程度較高，但在全球人脈網絡和種族多元程度方面則有所不及；其中又以來自中國內地者居多，來自美國等地者亦有。整體而言，人才流失之說未免以偏概全；事實上，相比於其他主要大都會，香港對環球人才依然極具吸引力。

從 LinkedIn 數據看 2019 年後人才流失與人才流入狀況

為評估人才流動，筆者集中研究在新冠疫情前後都有可識別地點和職位的 LinkedIn 用戶，樣本中包括疫情前後曾經到過香港者（見附錄）。

出乎意料，筆者發現，根據 LinkedIn 用戶社交資料計算，來港人數竟較外流人數為多。整體而言，疫情期間留在香港的 LinkedIn 用戶共計 255,911 人，來港有 31,835 人，離港則有 26,836 人。換言之，香港近幾年來既有人才流失，亦有人才流入。

近期香港外流的 LinkedIn 用戶以年輕人為主。【圖 1】（左方格圖）標繪出 LinkedIn 數據中各年齡組別流入香港的淨遷移比率；右方格圖則根據 Revelio Labs 的職業/職位水平模型，標示相對其估計年齡位居高薪要職潛力較高者的淨遷移比率。¹ 觀乎整體以及相對優秀的人才群組，在較具經驗及較為年長的組別中，筆者發現本港一直有淨人才流入。

流入香港的 LinkedIn 用戶教育水平較高，但國際化程度較低。【表 1】顯示，在 LinkedIn 擁有社交資料的外來移民，平均而言，其母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的名次高於離港者，而且差幅在統計分析上意義顯著。然而，在組成方面，人才庫多元化程度較低，本土化程度反而較高，估計其中非亞裔的比例已減半。基於多元化程度固定不變，按年齡來計算來港人士的聯繫人數目，以推算個人聯繫網絡的整體大小（年紀愈長，聯繫網絡愈大）；結果發現來港者的網絡較離港者為小，而且差幅在統計分析上意義顯著。

【表 2】顯示流入香港的 LinkedIn 用戶從何地而來，以及離港者前往何處。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印度的人口淨遷移量以及向新加坡、加拿大、澳洲的人口淨遷移量均偏高。尤

1 以 5 年劃分的年齡組別（25-29 歲、30-34 歲等）採用 Revelio 的估算模型，而筆者所選者則屬估計工資分布中最高 3 個十等分組別。

其矚目的是，來自美國的淨流入量看來不但呈現正數，而且人數最多。來自中國內地的人數實際上理應更多，不過內地人較少使用 LinkedIn 而已。²

高學歷人才方面，具哲學博士學位以及世界首 50 大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或碩士學位者，亦流失至新加坡和英國，但流失總數已由來自中國內地和美國的人才所抵消。整體上香港高學歷人才總數錄得淨增長。

特區政府人口數目及出入境數據

本研究選用 LinkedIn 用戶為研究樣本，同時採用特區政府的數據，作為以上分析的補充。筆者首先證實香港確實出現顯著人口流入；根據最新數字，新冠疫後人口急升。儘管人口由 2019 年底高峰期的 752 萬降至 2022 年中的 735 萬，至今已幾乎悉數回升。截至 2023 年中，香港人口總數為 750 萬（【圖 2】）。

有關數據亦力證來自中國內地人口流入量實高於 LinkedIn 數據所示。2023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約共 10 萬張工作簽證，遠較 2022 年的 38,559 張為多。人口流入激增原因之一，在於為應對人才流失而實施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為世界頂尖大學畢業生及高收入專業人士特快批核在港就業許可。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共有 30,183 人通過此項計劃來港工作，其中來自中國內地者佔 94.6%。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名額亦已大為擴充。根據入境事務處數據，2023 年上半年，共有 7,022 人透過該計劃獲批來港，其中 98.3% 來自中國內地；2022 年則僅得 2,845 人獲批來港。

跨國公司是否大量流失？

與一般人的想法相反，跨國公司並未大規模撤離香港。從 LinkedIn 的數據可見，設於本港的跨國公司總數未有減少。【圖 3】集中展示新冠疫情之前，在至少 3 個國家或地區聘有僱員的公司。出乎意料，在香港跨國公司任職的 LinkedIn 用戶大致上有所增加。

【表 3】顯示公司內部調職有助於僱員移居香港，因為離港移民者亦已離職。不少外來人才正好通過公司內部調職而來港發展。

2 有關討論詳見附錄。耐人尋味的是，即使以香港或其他中國姓氏為篩選準則，美國是香港人才流入的主要來源現象依然維持不變。

根據政府數據，非本地公司在香港勞工市場的重要性亦沒有減少。2018年，香港就業人口約有16.9%受僱於非本地公司；2022年的比率則為17.3%。

然而，正如【圖4】所示，本地跨國公司的組成則已出現變化。2018至2022年期間，設於香港的美國和日本公司地區總部分別減少17%和13%。同期，內地企業在港設立地區總部則大約增加27%，足以抵消美、日公司地區總部的減幅。

香港能否保持國際化和高技術水平？

香港的人才庫依然強大，並具國際競爭優勢，相對於中國其他城市而言尤其如此。筆者在【表4】臚列LinkedIn用戶的教育程度及其母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的平均名次，從而衡量城市的人力資本，然後按此將選定的16個城市和國家排名，發現香港足與全球各大城市比肩，而人才庫亦較北京、上海、深圳等內地城市強大得多。

再者，在香港居留的外籍人士數目未見減少。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香港的外籍人口數目在2011至2021年期間，由485,000漲至593,000。同期，除了外籍家庭傭工，香港的外籍人口由185,000增至254,000。

反觀近10年來，內地城市的外籍人口卻長期持續減少。2010至2020年期間，來自外國以及香港、澳門、台灣三地居於北京的人口總和，由107,000人下降至63,000人，跌幅高達42%。上海的對應數字則由209,000減至164,000，減幅大約18%。

由此可知，香港遠遠拋離國內其他城市，成為最國際化的中國城市。鑑於2020年內地的外籍人口總數只得846,000，香港一地的外籍人口已佔此數7成左右，而全港人口卻僅佔內地人口0.5%而已。

人才流動的引擎何在？

研究結果發現的遷移模式，有以下3種動力泉源。第一，香港民情對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政治抗拒有所紓緩，自從2019至2020年間發生的社會事件以來，對輸入內地技術人才已遠較以往開放。特區政府已宣布多項大計，在新界興建房屋，藉以加強與深圳企業的聯繫。³ 香港各大學的非本地生學額亦即將倍增。⁴

3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df/publications/Northern/Northern-Metropolis-Development-Strategy-Report.pdf>

4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1025122118185>

其次是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由於地緣政治重新調整，加上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因素，外國對中國的資金流動已大為減少。內地中產階級日益傾向將資金和人才配置投放於資本回報與工資均較高的國際市場。

動力之三在於海外華人正面臨愈來愈緊張的地緣和種族關係，在美國尤其如此。這有助於促使部分海外華人移居香港。

香港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政策相對嚴厲，或也許是另一動力泉源，效果如何則不得而知。防疫嚴格，以策萬全，也許會吸引關注健康風險和因公共服務停擺而造成干擾的一群來港，亦也許會令為求擺脫限制的港人離去。疫情肆虐之際，香港在防疫措施方面雖較內地寬鬆，卻較不少西方國家嚴格；由於至今仍未經周全完備的分析，難以確定相關影響。

人才流入對香港經濟有何影響？

外來人才應有利於本地經濟，目前已有跡象可見，能為不同行業帶來需求，包括入讀本地學校的內地生持續增加。大學鄰近地區如堅尼地城租金已水漲船高。本地中小學亦錄取較多新來港的內地學童。在利率趨升的背景下，本港銀行及保險業產品需求有增無已。

人才流入或同時有利於促進商業蓬勃發展，並增添創新動力。舉例來說，內地龍頭外賣平台美團就銳意在香港市場大展拳腳。⁵ 本港市場規模有限，內地企業南下發展向來無利可圖；然而，內地市場發展已達飽和，整體增長疲弱，以致各大企業紛紛將投資與業務擴展至香港，為進軍國際市場鋪路。

政策建議

總的來說，本文數據顯示，香港在面臨人才外流的同時，亦迎來關鍵性人才流入，足以產生互相抵消的作用。有別於過去20年來港的低技術移民，今日的外來人口以技術人才為主，其中胸懷國際視野、抱負遠大者大不乏人。這類新移民將發揮驅動香港經濟增長的作用，並強化特區作為內地家庭和企業進軍海外市場門戶的角色。疫情既已消退，鑑於這類人才對經濟前景至關重要，香港宜加倍努力加以挽留和招徠。

首先，有關當局可運用和整合各類行政及企業數據集，監察勞動市場的健康發展，從而改善政策設計，並對站不住腳的失實言論予以駁斥。正如本研究顯示，已知數據與香港

5 <https://pandaily.com/meituan-delivery-takes-four-months-to-expand-from-kowloon-to-hong-kong-island/>

正長期陷入人才凋零困境的廣泛悲觀論調背道而馳。雖然數據表明總人口中亞裔佔比日增，但香港仍繼續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移民，而近年來整體人才庫的技術水平看來更有所提升。

其次，香港可考慮制定挽留年輕一代的勞工政策。在有關數據中，筆者發現青年屬移民意欲最高的社群，皆因大多社會地位未穩，而事業發展仍在探索路上，難免對未來感到困惑。為減少這類外流移民，特區政府不妨以挽留這一社群為長遠目標，採取一系列措施，如提供持續進修津貼或海外獎學金，條件為必須在進修後回港工作。

圖1 LinkedIn用戶中按年齡組別劃分人才淨流入/外流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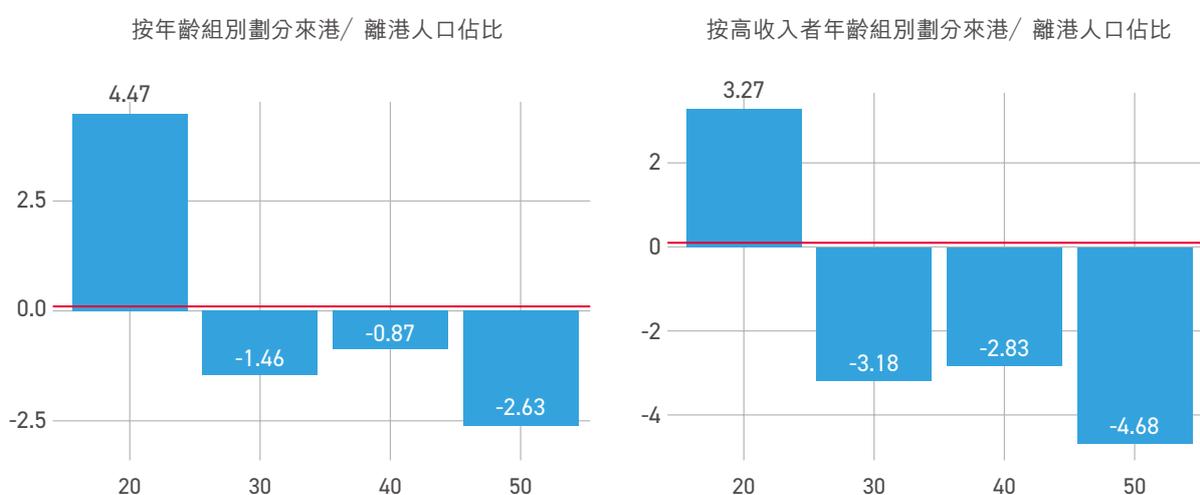


圖2 2017-2022年香港人口



圖 3 LinkedIn 用戶所任職跨國公司人手增長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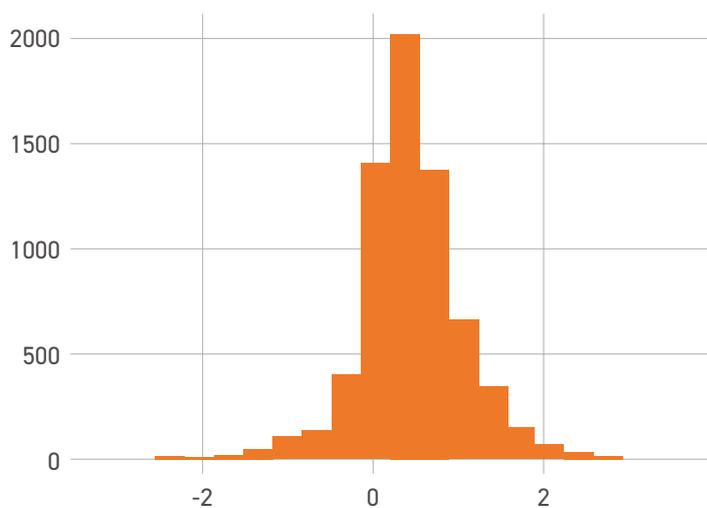


圖 4：2018-2022 年設於香港的地區總部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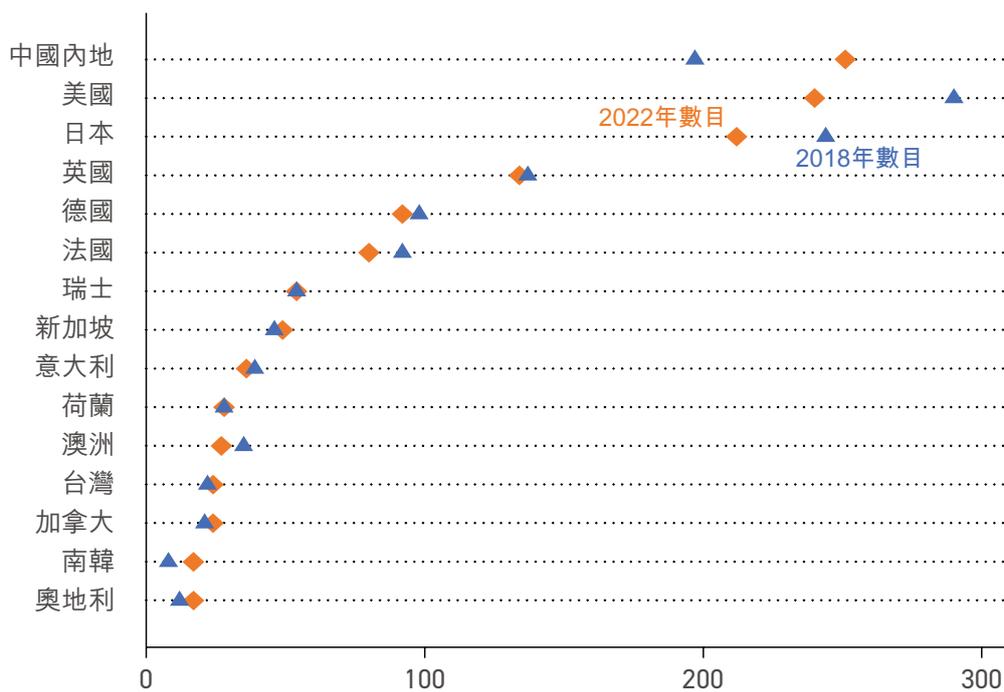


表1 LinkedIn 用戶中外來及外流人口的一般資料

	Joiner 來港者	Leaver 離港者	t-test t檢驗
Averag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 (lower → more elite)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平均數(較低→較高)			
Master's 碩士	163.48	191.84	-4.29
Bachelor's 學士	211.54	263.24	-16.11
MBA's 工商管理碩士	229.35	284.26	-2.86
PhDs 哲學博士	137.79	172.17	-1.97
Other statistics 其他統計資料			
Age 年齡	33.59	32.28	17.61
Estimated Salary ⁶ 估計薪金 ⁶	59545	53624	31.01
Asian 亞裔	0.79	0.58	
Connections (LinkedIn) 聯繫人數目 (LinkedIn用戶)	200	339.04	-15.83
Connections/Age 聯繫人數目/年齡	6.55	10.63	-11.45

6 估計薪金以 Revelio 模型為根據，其中考慮因素眾多，包括個人所在地域。雖然地域因素決定性較低(而職業、行業、公司、學歷則足以成為主導因素)，將之納入評估標準或會令人費解，惟亦須考慮到 LinkedIn 用戶原居地生活水平和薪金或高於香港。

表2 LinkedIn用戶中按地域劃分的人才流動

Region 地域	Leave HK 離港	Join HK 來港	Join - Leave 流入-外流	Turnover 更替
United States 美國	5654 (242)	10186 (302)	4532 (60)	15840 (544)
Mainland China 中國內地	3421 (141)	5032 (210)	1611 (69)	8453 (351)
United Kingdom 英國	3010 (151)	3126 (129)	116 (-22)	6136 (280)
Singapore 新加坡	2173 (138)	1497 (115)	-676 (-23)	3670 (253)
Australia 澳洲	1725 (46)	1321 (25)	-404 (-21)	3046 (71)
Canada 加拿大	1297 (81)	684 (48)	-613 (-33)	1981 (129)
India 印度	516 (5)	1275 (6)	759 (1)	1791 (11)
France 法國	984 (12)	725 (4)	-259 (-8)	1709 (16)
Taiwan 台灣	449 (15)	564 (26)	115 (11)	1013 (41)
Japan 日本	548 (18)	462 (20)	-86 (2)	1010 (38)

表3 LinkedIn用戶在公司內部調職與轉職跳槽對比

Transition 調職	Move company 跳槽	Counts 人數	Proportion 比例
Leave HK 離港	Different company 跳槽	21690	6.83
Leave HK 離港	Same company 調職	5206	1.64
Join HK 來港	Different company 跳槽	21136	6.65
Join HK 來港	Same company 調職	11775	3.71
Stayed in HK 留港	Different company 跳槽	72659	22.86
Stayed in HK 留港	Same company 調職	185317	58.32

表4 全球選定主要城市人力資本排名 (根據LinkedIn用戶社交資料)

學士、哲學博士、工商管理碩士比率是指由LinkedIn用戶填報獲頒此等學位的比率。學士、碩士、哲學博士排名指某學府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的整體排名(而非以個別學位為依據)。

Location 地域	LinkedIn users LinkedIn 用戶	Bachelor rate 學士比率	MBA rate 工商管理 碩士比率	PhD rate 哲學博士 比率	Founder rate 創辦人比率	Bachelor Rank 學士排名	Master Rank 碩士排名	PhD Rank 哲學博士 排名
San Francisco 三藩市	1052372	2	2	1	2	2	3	3
Los Angeles 洛杉磯	1396690	10	13	8	1	4	1	2
New York 紐約	4531237	6	6	5	7	6	5	7
Hong Kong 香港	636742	9	7	10	12	1	2	1
Sydney 悉尼	1116363	3	10	12	5	3	7	4
Chicago 芝加哥	1307694	5	3	6	11	7	4	8
Melbourne 墨爾本	1052652	1	12	7	6	5	8	6
Switzerland 瑞士	778234	12	4	3	4	9	6	9
Toronto 多倫多	1372302	4	5	11	9	10	10	10
Singapore 新加坡	1289905	7	8	14	15	8	9	5
London 倫敦	3503532	8	14	13	3	11	13	11
Tokyo 東京	307889	13	11	4	10	15	15	15
Shanghai 上海	712040	14	9	9	14	13	12	13
Beijing 北京	508173	15	15	2	13	14	14	14
Dubai 杜拜	2209764	11	1	15	16	16	16	16
Shenzhen 深圳	375386	16	16	16	8	12	11	12

附錄：數據及樣本構建

本研究項目的 LinkedIn 檔案由 Revelio Labs 公司搜集所得，該公司專門從事有關工作人口公開數據的搜集和匯總，藉此建立全面的就業記錄數據庫。其他學者根據 Revelio 數據集所發表的研究論文有 Baker et al. (2022)、Cai et al. (2022)、Charoenwong et al. (2022)、Liang et al. (2022)。為切合本研究的主要樣本所需，筆者構建出一個「個人與時期」面板，然後透過用戶在其社交資料或時間點的職位地點（例如：甲某在乙公司任職，標示為身在香港），而抽取所有曾經在港的用戶。用戶的社交資料都有標示地點，但往往並不將地點與職位掛鉤。要斷定用戶所在地點，筆者假設職位地點（若有提供）較社交資料地點為可靠。

上述數據雖然包含有關移民人口特徵的詳盡資料，但其中仍有部分偏差值得留意。一、資料並非實時更新。筆者從 2023 年 10 月起截取相關數據，但用戶更新社交資料時有延誤。延誤期一般多長難以得知，據 Revelio 公司所提供的非正式估計，延誤期可長達數月之久。二、用戶數據因分不同時段抽取，或未能每次都取得 LinkedIn 所有用戶的檔案。三、用戶或會以錯誤資訊或延遲更新的資訊來更新其社交資料。Revelio 雖已試圖採用機器學習模型，剔除濫發資訊的社交資料，但一如所有機器學習模型，其效用未必完全準確無誤。四、基於國家的審查規則，而本地競爭公司亦漸多，來自內地的移民使用 LinkedIn 機會較低，以致難以與內地城市作出基準比較。五、從事高技術職業的人口較多屬 LinkedIn 用戶，本研究樣本搜集所得的技術人才難免偏多，筆者於是採用特區政府相關數據，作為佐證。

參考文獻

- A. Baker, D. F. Larcker, C. McClure, D. Saraph, and E. M. Watts. (2022). Diversity washing. Chicago Booth Research Paper, (22-18).
- Cai, W., Dey, A., Grennan, J., Pacelli, J., & Qiu, L. (2022). Do diverse directors influence dei outcomes? Available at SSRN.
- Charoenwong, B., Kowaleski, Z. T., Kwan, A., & Sutherland, A. (2022). Regtech.
- Liang, C., Lourie, B., Nekrasov, A., & Yoo, I. S. (2022).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workforce gender diversity. Available at SSRN 3971818.



知識產權商業化
有利香港經濟
高質發展

知識產權商業化有利香港經濟 高質發展

鄧希煒
張超藝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在回顧西方經濟崛起時指出，18世紀的「工業革命」是源自社會此前一系列的制度變化。在17世紀末，英國已漸漸形成一系列鼓勵生產效率的制度和法律，確保各生產要素均能獲得相當於其經濟價值一大部分的回報。其中，專利制度和其他知識產權法律的發展促進了創新的增長，這種制度創新不僅提升私營經濟活動的盈利能力，還將各種界外效應加以內化，最終驅動社會效率和產出的改進。¹

時至今日，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各地已非新鮮事物，但各地在法律、執法、商業化乃至社會文化等方面仍存在明顯差異。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未來各個經濟體在全球激烈競爭中的成敗，或將取決於能否建立起高效的知識產權制度，以維持在創新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

因此，制度創新仍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儘管香港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國際聲譽相當不俗，但仍需加速知識產權商業化的進展，以放大知識產權制度的經濟效益。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的安排下，香港迎來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發展機遇，但定位及發展策略未見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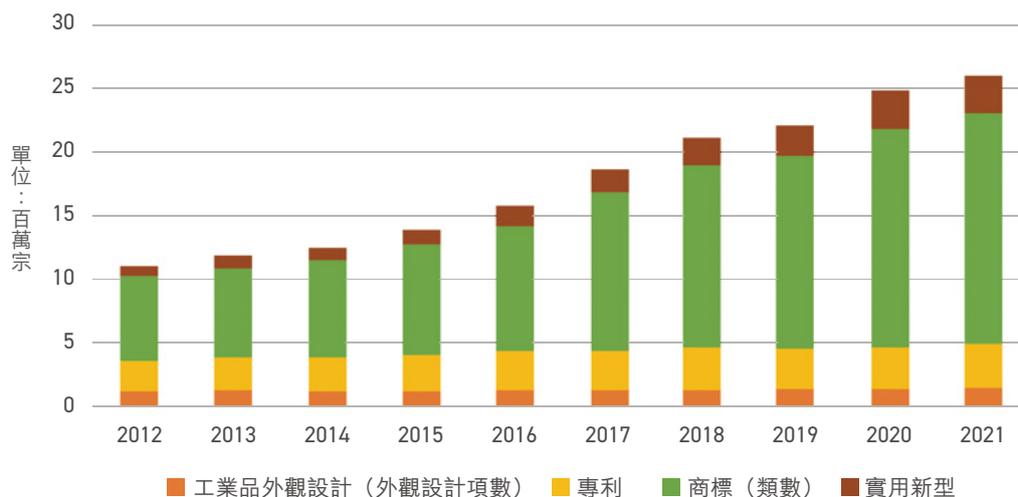
有鑑於此，下文將勾劃全球知識產權商業化的進展，並參考中國、美國和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從而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建議：

1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aul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3, no. 1, 1970.

1. 發掘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龐大潛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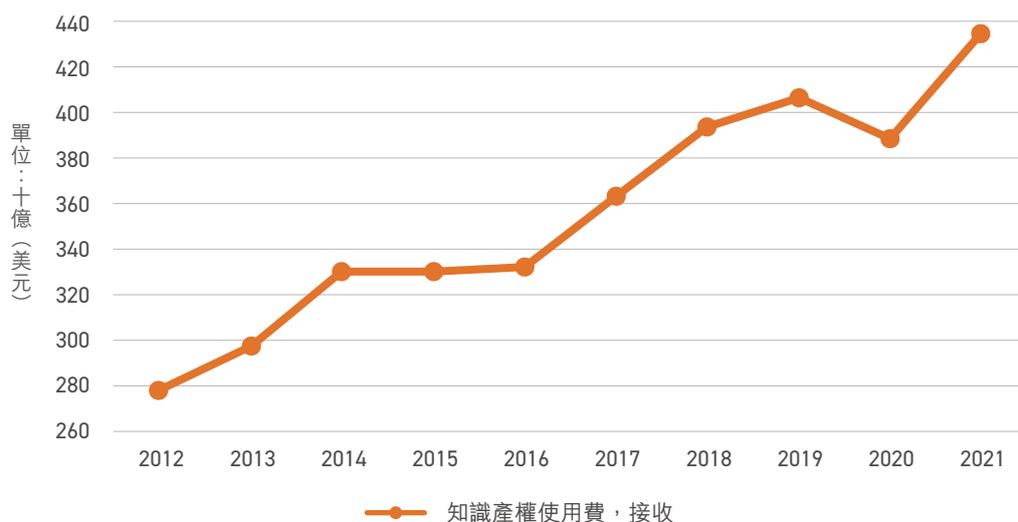
全球知識產權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顯示，全球知識產權申請總數從2012年的1,100萬宗增至2021年的2,600萬宗（【圖1】）；而世界銀行的數據則顯示，知識產權國際貿易總額從2012年的2,780億美元大幅漲至2021年的4,350億美元（【圖2】）。

圖1 2012-2021年按類型劃分的全球知識產權申請總數



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數據庫（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2月）

圖2 2012-2021年全球知識產權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數據庫（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2月）

與此同時，知識產權亦已證明足以產生巨大的界外效應，在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之餘，亦為社會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例如，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的研究顯示²，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於2019年佔該國經濟產出41%，為全國創造出44%的就業機會；而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從業員的每周平均收入為1,517美元，較非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947美元高出60%。

歐洲專利局及歐盟知識產權局的研究亦發現³，於2017至2019年期間，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每周人均成本為840歐元，較非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597歐元高出近41%。同期，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為歐盟創造出39.4%的就業機會，貢獻歐盟本地生產總值(GDP)逾47%，佔歐盟各國之間貿易超過75%，佔對外貿易超過80%，並產生2,240億歐元的貿易盈餘。

專利密集型行業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亦日益增加。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數據⁴，中國專利密集型行業的增加值從2018年的10.7萬億元人民幣上升至2021年的14.3萬億元人民幣，佔GDP的比重由11.6%增至12.44%。2021年，專利密集型行業創造出4870萬個職位，佔總就業人數的6.52%，高於2018年的6.18%；而專利密集型行業就業者每年收入為11萬6千元人民幣，較非專利密集型行業高出10.2%。同年，醫藥醫療、資訊及通訊科技、製造業等七大專利密集型行業分別實現了12.5%至40.9%的增長率，實際上支撐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2. 知識產權活動重心正轉向亞太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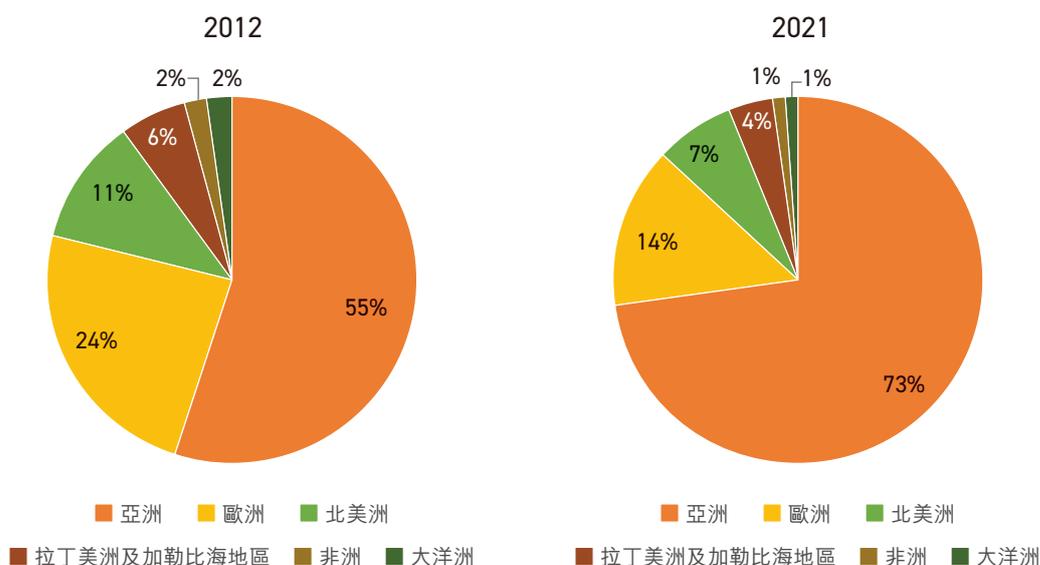
隨着數碼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科技競賽的全球趨勢，全球對知識產權商業化一直大有需求，而活動重心亦正在轉向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顯示，亞洲地區的知識產權申請總數於2021年已佔全球的73%（【圖3】）；從2012至2021年的10年間，中國知識產權局的專利申請總數持續攀升，躋身世界20大知識產權局的專利申請總數之列，佔比由29%持續增加至49%（【圖4】）。

2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2022).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 Third edition.

3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2022). *IP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report*. Fourth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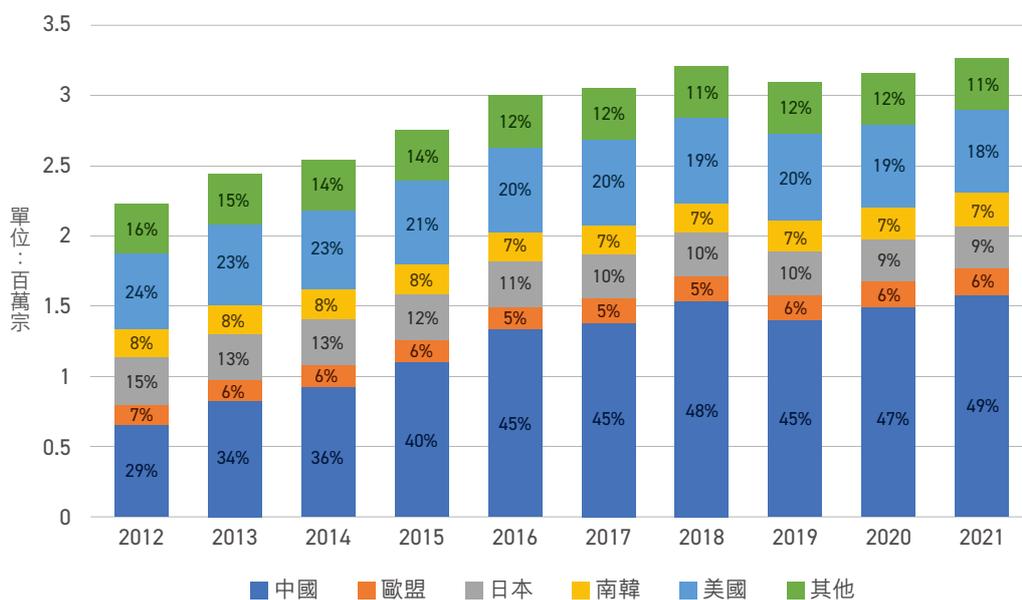
4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23)：《2021年我國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2.44%》。網址：https://www.cnipa.gov.cn/module/download/download.jsp?i_ID=183178&colID=88

圖3 2012年及2021年按地區劃分的全球知識產權申請總數



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數據庫（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2月）

圖4 2012-2021年世界20大知識產權局的專利申請



資料來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數據庫（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2月）

在此背景下，亞洲對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需求與日俱增，但香港若要把握機遇、突圍而出，還須了解知識產權在商業化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並以取自外地的經驗為基礎，根據自身獨有優勢制定發展策略。

3. 構建知識產權商業化生態系統的挑戰

根據筆者與20多位知識產權生態系統專家(包括創作、應用、商業化、貿易以至專業服務)的個人訪談，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挑戰幾乎涵蓋生態系統中所有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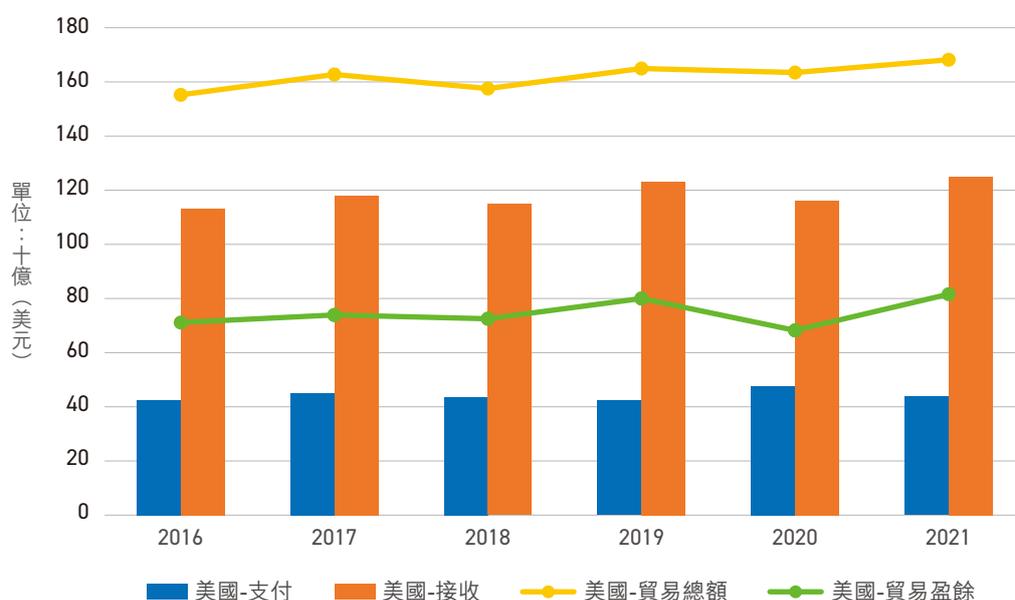
- **法律框架及執法：**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有效的執法對於保障知識產權來說不可或缺。處理知識產權法律糾紛往往涉及高昂成本。另一方面，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缺乏協調，而部分國家的執法機制不足，導致跨境知識產權商業化難以進行。因此，各地政府需要建立明確一致的法律框架、協調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法律制度差異、確保知識產權在本地和國際間均得到充分保障，並尋求各種具成本效益的機制，包括替代爭議解決方法，以促進知識產權商業化。
- **估值機制：**準確估值知識產權雖有必要，卻因為涉及金融和技術專長，或會成本高昂，也不易為。另一方面考慮到知識產權交易的跨境性質，亦往往涉及第三方的估值服務。因此，各地政府須與各持份者合作，就知識產權估值建立通用標準，從而降低中小企業進行知識產權估值的成本，以便將創新成果推出市場，並利用知識產權進行融資。
- **資訊傳播：**知識產權買家和賣家需要準確的資訊，以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因此，有需要建立一個透明的資訊共享框架和各種有效的交易平台，讓持份者易於獲取所需資訊，並促進買賣雙方的聯繫，從而降低交易成本。
- **風險管理：**有必要評估技術過時的風險，並持續監察市場變化，以優化知識產權投資組合。此外，在取得任何知識產權或收取任何知識產權特許權費之前，必須透過盡職調查管理侵權風險，並制定執行策略，以維護知識產權。
- **獎勵持份者：**知識產權商業化的初期，由於涉及人員、設備及材料等方面的巨額投資，成本可以很高。再者，營銷及分銷也支出不菲。政府有必要通過資助、稅務優惠等政策，鼓勵各持份者參與其事。

4. 中國、美國、新加坡的知識產權商業化

4.1 國際貿易

美國的全球知識產權貿易總額和貿易盈餘甚為可觀(【圖5】)。2016至2021年期間，美國的知識產權貿易總額介於1,549.6億美元至1,679.6億美元之間；而知識產權貿易盈餘則由678.5億美元增至812.7億美元。數據反映美國在全球知識產權貿易中的主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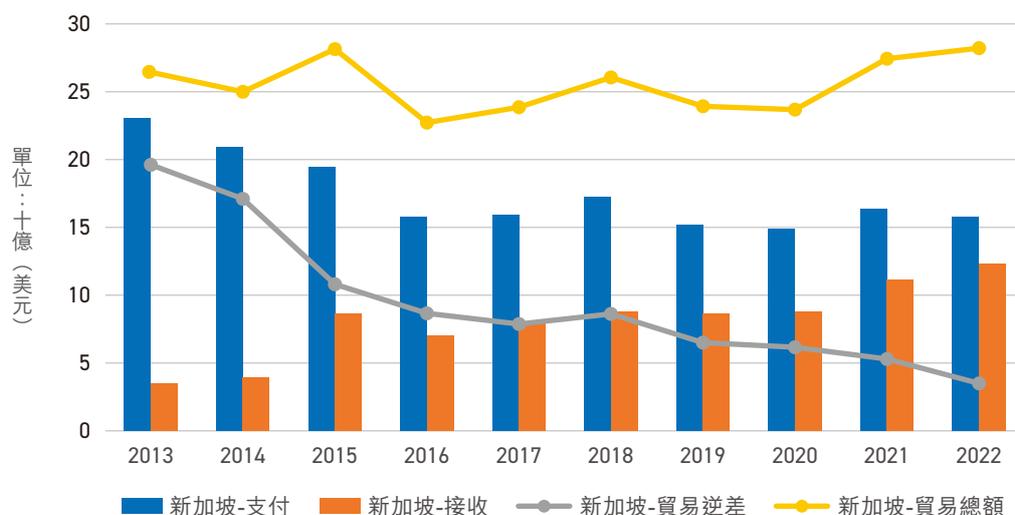
圖5 2016-2021年美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收支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新加坡的知識產權貿易逆差迅速收窄(【圖6】)。2013至2022年期間，新加坡的知識產權支付總額雖見波動，但整體呈下降趨勢，而知識產權收益總額則大幅增加，導致知識產權貿易逆差從195.8億美元急跌至34.6億美元。與此同時，該國知識產權貿易的整體規模保持相對穩定。數據反映新加坡從知識產權進口國轉為知識產權出口國的過程中，取得明顯進展。

圖6 2013-2022年新加坡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收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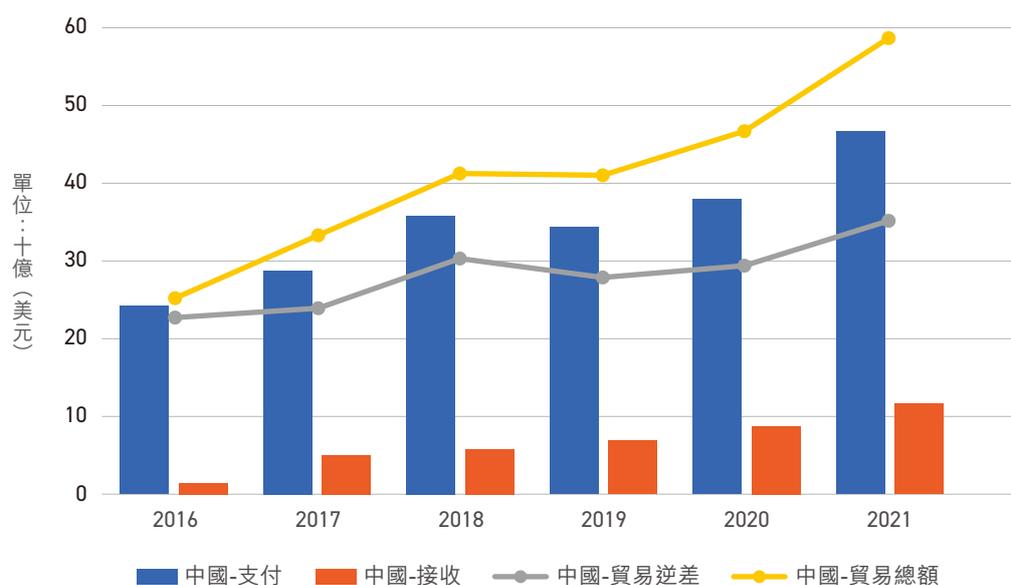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從【圖7】可見中國的知識產權貿易規模持續增長。2016至2021年期間，中國的知識產權貿易總額增加逾1倍，從251.4億美元上升至585.9億美元；出口更從11.6億美元增至117.4億美元，增幅逾10倍。然而，由於知識產權進口同時從239.8億美元增至468.5億美元，中國的知識產權貿易逆差仍從228.2億美元升至351.1億美元。

數據反映中國知識產權貿易的迅速發展。知識產權進出口總額大幅增長，標誌著知識產權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作用愈來愈大。知識產權出口大幅增長，則代表中國已在全球知識產權帶動的行業領域嶄露頭角。然而，其知識產權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亦反映中國對外國的依賴程度依然甚高。

圖7 2016-2021年中國知識產權貿易進出口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4.2 美國的發展特色

對於知識產權商業化的挑戰，中美兩國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美國推動知識產權商業化的主力來自私人市場，而中國則往往由政府自上而下策動。

在由私營界別主導知識產權市場的美國，IAM Market 等私營平台讓專利賣家能夠公開展示其專利，並與感興趣的買家進行直接交易；而「行業專利購買計劃」(Industry Patent Purchase Program) 則透過設定固定期限及固定價格的方式，簡化交易程序、降低議價成本。

美國政府的角色基本上是營造有利環境，鼓勵發明家、企業及投資者參與知識產權商業活動。例如，美國專利商標局通過其建立的「專利合作夥伴」平台(Patents 4 Partnerships)，集中列出與美國專利相關的資料，從而降低資訊搜索成本，以便技術擁有人與潛在買家聯繫。美國專利商標局還推出了法律學院實習認證計劃(Law School Clinic Certification Program)，容許法律系學生在註冊律師或代理的指導下，代表發明人申請及註冊專利和商標，為處於初創階段的創新者提供另一低成本的專業法律服務。

此外，美國國家知識產權協調中心與阿里巴巴、默克集團、3M、美國電影協會、美國專利商標局、歐洲刑警組織等公私營機構合作，打擊侵權行為，為美國的知識產權提供保障。

美國的案例反映促進高效知識產權市場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凸顯出政府在營造有利環境、推動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從美國專利商標局與美國國家知識產權中心的成功經驗，可知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機構如何重要。

4.3 中國的發展特色

中國在全球知識產權商業化中的角色愈發重要，其每年的專利授權量、知識產權貿易量，以及對全球《專利合作條約》體系的影響力均不斷上升。在創新和自主技術的融資需求帶動下，中國的知識產權融資主要側重於培育中小型企業和高科技企業。

中國作為後起之秀，近年來由上而下大力策動知識產權商業化。例如，國務院在2021年9月發布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中，提出若干工作及發展目標，其中包括專利密集型行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於2025年達到13%。

儘管中國在發展市場化融資模式和執行國際認可標準方面的能力相對薄弱，但政府已採取積極行動，獎勵知識產權商業化。為建立有效的知識產權交易二級市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於2022年宣布建立若干國家級機構的計劃。此外，若干省份亦已經就知識產權融資實施補貼政策，以降低貸款利息、保費、估值費等相關成本。

中國政府亦透過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和多家專門法院，努力加強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障。與其他地區的做法相類似，中國透過設立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提供具成本效益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方案。在北京，多家專業機構亦已成立，專門處理電子、軟件、醫療等行業的內部糾紛。

中國的知識產權估值機制由金融機構的內部評估、獨立第三方專業機構和政府附屬組織提供的估值服務所組成。然而，由於缺乏全國通用的無形資產估值標準，加上專業人員短缺和二級交易市場尚未成熟，不足之處仍然明顯。

為了加強知識產權商業化的風險緩解機制，中國政府亦向擔保機構提供專項基金，並與金融機構按不同比例共同分擔風險。另一種降低知識產權融資風險的做法，在於要求以一籃子資產作為抵押品，這可以是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的組合，也可以是將專利、版權、商標等知識產權作捆綁抵押。

中國的案例凸顯出政府在推動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雖然中國在全球知識產權商業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其在發展成熟的二級市場、執行國際認可的估值標準、執法、培訓專業人才等方面仍面臨挑戰。這為香港提供了充裕的機會，為國家作出貢獻之餘，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交易中心。

4.4 新加坡的發展特色

新加坡憑藉由政府主導的有力措施和大量投資，將自身定位為國際領先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新加坡政府已經為知識產權交易建立高效的二級市場，以促進生態系統內各個環節的連接。例如，創新伙伴影響力(Innovation Partner for Impact)推動的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place)，以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推出的合作貿易市場(A*STAR Collaborative Commerce Marketplace)均提供富有活力的平台，將技術供應商與企業聯繫。此外，新加坡知識產權局亦已經與中、美等主要國家建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安排，以鞏固其作為全球與亞洲知識產權中心的地位。

除此之外，新加坡亦積極採取措施，加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及人才培養。新加坡政府於2012年成立知識產權法院、2013年發布知識產權法院指引，又於近年推出《2021年版權法》和《2021年知識產權(修正)法案》，以確保其相關法律能夠與時並進。由2022年4月1日起，新加坡知識產權局將「強化調解推廣計劃」延長3年，並易名為「經修訂後的強化調解推廣計劃」。該計劃為參與新加坡知識產權局訴訟程序的各方提供補貼，鼓勵他們選擇調解作為審訊的替代方案。此外，新加坡早於2003年已成立知識產權學院，專門培育知識產權法律人才。

在知識產權估值方面，新加坡嚴格遵守國際評估準則理事會頒布的標準，同時也嘗試以《國際無形資產評估準則》(IVS 210)為基礎，制定其無形資產/知識產權的評估指引。再者，新加坡知識產權局亦已承諾培訓一批持有認可資格的無形資產/知識產權評估師。近年來，政府積極鼓勵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披露其擁有的無形資產。2020年，新加坡交易所與新加坡知識產權局共同發起「無形資產披露評估及審計計劃」，為企業評估其無形資產提供財政支持。近期，新加坡發布「無形資產披露框架」，為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提供指引，建議以自願形式披露公司無形資產的相關資訊。

2021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新加坡知識產權策略2030》，對生態圈提供全方位支持。該策略涵蓋三個相互關聯的範疇，其中包括強化新加坡作為全球知識產權中心的地位、吸引運用知識產權的創新企業並推動其發展，以及於知識產權領域創造理想的工作機會和發展具價值的技能。

新加坡的案例展示出政府在培育知識產權生態圈方面的重要角色，這包括為知識產權交易建立有效的二級市場和與時並進的法律框架，亦包括促進透明資訊的傳播，以及培育法律人才。此外，新加坡的案例亦凸顯出須為知識產權融資構建一個完善生態系統，單靠補貼並不可取。

4.5 總結三國發展經驗

綜觀美國、中國及新加坡的經驗，儘管三國政府應對知識產權商業化相關挑戰的策略不盡相同，但在其解決框架中仍能發現一些相似的元素。為構建一個有利於知識產權商業化的生態系統，三大經濟體均透過建立有效的二級市場，以促進資訊透明度及鼓勵知識產權交易。除此之外，三個經濟體還透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更新法律法規、制定估值標準，以及鼓勵調解作為具成本效益的替代爭議解決方法，以鞏固各自的法律框架。

由於註冊、法律、估值、融資、保險及其他知識產權服務或相關產品一般涉及高昂的成本，三國政府通常亦會向相關持份者提供補貼、稅務優惠或其他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此外，三國對人才發展和專業培養亦十分重視，無論是透過大學、行業組織還是政府，均有提供各種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課程，甚至資助。

最後，三大經濟體還與國際社會通力合作，例如建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加強與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專利局合作，相互承認彼此批准的專利並簡化審批程序，以鞏固自身在全球知識產權領域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經濟體的經驗均存在獨特性和局限性。美國的知識產權市場所以興旺，皆因其擁有世界一流的研發能力、金融體系及經濟規模。美國允許私人參與者在市場上建立平台和經紀公司固然有明顯好處，但不利之處在於經紀公司具有收購專利集群的誘因，因而削弱創新公司之間的市場競爭，並因市場壟斷而窒礙創新。中國則由政府主導，從而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以確保政策得以有效實施。另一方面，新加坡雖曾提供知識產權估值補貼，以鼓勵企業參與「知識產權融資計劃」（IP Financing Scheme），但參與率卻未如預期，計劃於2018年以失敗告終。

5. 八大建議推動香港知識產權商業化

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作出不少努力，例如發展「原授專利」制度、推動《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協定有關議定書》在本地實施，以及推出「專利盒」稅務優惠，對通過研發活動而產生的合資格專利，為其源自香港所賺取的利潤提供稅務優惠。

儘管如此，由於地區競爭激烈，香港在知識產權商業化方面的進展仍有不足。因此，必須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把蛋糕做大，從而調動各持份者將香港建設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香港擁有經驗豐富、高效率的專業服務業，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雄厚的基礎研發實力。在借鑑外地經驗的同時，我們亦應善用香港的優勢，為香港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基於國別研究案例，以及對香港和上海超過 20 位持份者及專家進行的訪談，香港可以考慮以下 8 項政策建議，以加強生態系統建設，促進知識產權商業化發展：

1. 以綠色金融框架為範本，制定標準，鼓勵公司披露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投資與項目，以及協助企業利用知識產權，以無形資產作融資抵押。
2. 建立估值準則、利用大數據提供參考價格，以及提供補貼和風險分擔計劃，以降低知識產權估值的成本及風險。
3. 建立知識產權持份者聯盟，以匯集資源推動科研成果商業化。
4. 與內地加強合作，打擊侵權行為；鼓勵透過調解解決爭端，以降低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成本。
5. 提供年度財政資助及發展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以激勵持份者參與，構建知識產權商業化生態系統。
6. 與各大學及國際組織合作，開辦知識產權課題相關的本地課程；為知識產權相關專業人士提供招聘補貼，從而強化知識產權人才庫。
7. 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參與專利審查高速公路，並擴闊知識產權平台國際網絡。
8. 政府通過「香港增長組合」等投資基金，採購生命健康科技等先進行業的知識產權。





偉大城市： 強化香港國際 航空樞紐地位 的重要性

偉大城市：強化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性

陳南祿

偉大城市的挑戰

近幾十年來，怎樣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兼中國一大超卓城市，廣獲多方進言。一個城市偉大之處何在，又如何更上層樓，亦引發了一番熱烈論辯。

本文闡述並分析世界級大都會必備的一個關鍵條件以及香港是否具備此一條件。

一個城市的財力是否雄厚、影響力是否舉足輕重，取決於多項要素，一般人馬上會聯想到該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有何過人之處：諸如毗鄰天然資源、擁有深厚的文化、宗教和傳統、完善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獨特的旅遊景點或充裕的人力資源等等。以上各項都至關重要，但其重要程度會隨著社會、政治、文化、科技發展而有所變化。

事實上，上述許多因素未必能單獨發揮主導作用。位處歷史遺產和作為宗教重地的城市，不一定傲視全球。資源豐富的城市也不一定能成為遊客勝地。人口多寡更絕非衡量城市偉大程度和影響力的要素。而從地理位置上而言，倫敦、紐約和阿姆斯特丹這些國際大都會也非超群絕倫；有些主要國家的首都或政治中心也不列入頂級城市。

至於大公司總部林立是否作為頂級城市的必然要素，可借鑒美國西雅圖。在該市設置總部的世界級企業眾多；如微軟、Expedia、諾德斯特龍百貨、好市多、星巴克、帕卡、MOD、波音、亞馬遜、Redfin、阿拉斯加航空等等。但以城市級別而論，它與紐約、芝加哥或洛杉磯不可同日而語。

緣起絲路

對於一座城市有何偉大之處，歷史提供了不少有力線索。六、七百年前，威尼斯主宰歐洲至中東和亞洲之間利潤豐厚的貿易通道，因而繁榮強盛。同一情況也發生在一千年前的中國。當時的長安（現今西安）也拜絲綢之路所賜而盛極一時。絲路是西方與中國之間的樞紐；兩千多年前則是羅馬的天下，皆因羅馬人不斷擴張帝國版圖，使其成為「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偉大樞紐。

把時間拉近到現代，在新加坡冒起之前，馬六甲、果阿和澳門一度是亞洲的主要貿易及航運港口。這些城市成功的關鍵，不在於其土壤肥沃或坐擁天然資源，而在於其位處當時國際交通要衝，隨着貿易蓬勃發展及行旅路線開拓日廣而受惠。後來，運輸技術革新，貿易通道改變，這些城市也從此不復盛世風光。

在發展過程中，偉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特殊關係，正是本文的焦點。雖然此重點經常被忽視，但其實位處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至今不改，且顯而易見。

隨着航空交通的興起，當代商貿中心都是航空樞紐。倫敦、新加坡、香港、東京、杜拜和紐約均是例子。

這些偉大城市都是主要的航空中心。

也許有人會爭論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偉大城市與其賴以支撐的交通網絡，兩者之間應怎分主次？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擴展航空聯繫與發展現代偉大城市作為貿易、金融、服務、旅行和旅遊業的支點，一直並行不悖。往返這些航空樞紐非常便捷，確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大支柱。四通八達的強大航空聯繫，更有助於城市的財政實力日益壯大、影響力更為廣泛及人口持續增長。

本地航空公司的貢獻

世界主要的航空中心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擁有實力雄厚的本土國際性航空公司。這不僅是國泰航空和香港的論據，也同樣適用於英國航空和倫敦、新加坡航空和新加坡、阿聯酋航空和杜拜、聯合航空和芝加哥等等。

擁有強大本土航空公司的優勢不言而喻；作為本土航空公司旗艦，自會積極將其基地推廣為旅遊、服務和商業中心，如此做法符合其自身利益。至於海外航空公司則主要對其總部所在地效忠。

此外，本土國際航空公司也對當地經濟大有貢獻，龐大的外匯進帳自不待言。國泰航空約有四分之三收益源於海外，新加坡航空的收益比率也與此相近。基本上航空公司藉輸出航班空位從而賺取外匯，來自小國或地區的航空公司尤其如此；其中涉及的海外收入非同小可。在許多國家，航空公司的「出口職能」及其作為外匯收益來源的角色極其重要。

此外，在總部所在地的經濟中，本土航空公司亦經營一整套高增值總部業務，以及一系列支援業務，包括飛行員、機組人員及其他培訓、先進的資訊科技、餐飲、地勤服務、貨運物流、採購和飛機維修等等。

本地航空公司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國泰航空及其子公司當年在香港僱用了約 26,000 名員工；新加坡航空集團在本國亦有相若的僱員人數。反觀航空公司在海外的僱員人數，以國泰為例，該公司基本運載逾 100 萬名乘客來往日本，但在當地的員工數目不到 300 名。英國航空、澳洲航空、泰國航空、新加坡航空和加拿大航空，雖在香港市場都佔有重要席位，但各自在香港業務所僱用的人員少於 100 名。

本土航空公司在其基地有大量高技能高質素的職位。細看其總部職能，就可見航空公司為本身產業創造的一系列增值就業崗位，是可壯大總部基地經濟的勞動力。例如飛機維修、規劃、管理、營運、財務、顧客服務、電腦技術和貨運物流等。

強大的本土國際航空公司往往是一個國家最廣獲認可的品牌。航空公司實質上充當品牌大使，擦亮總部所在地的形象，同時令國民對國家的成就倍感自豪。隨便請一位路人列舉某一國家的五大品牌公司，當地的航空公司定必榜上有名。

強大的本土航空公司也有助於擴充旅遊業。為了增加市場份額，航空公司會積極吸引乘客前往其基地所在的國家旅遊。所有來客都會消費，因而帶動其他行業的收入，如餐飲、零售和酒店。這會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不僅有利於旅遊業和貿易，也會直接惠及相關的行業，如零售和陸路運輸。航空業對經濟的乘數效應非常可觀。

2003 年爆發的「沙士」和 2020 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並證明旅遊業是香港經濟極為重要的支柱。城市的航空和人流就像身體中的血液流動。缺乏流通的航空和旅遊活動會令整體經濟低迷。

本土航空公司對其基地肩負重要的義務。當年 9-11 事件令香港經濟飽受衝擊，國泰航空推出大抽獎活動，免費送出 10,000 套來回機票，是同類大型活動的創舉。沙士疫情過後，本地航空公司持續與本地旅遊、零售及食品業緊密合作，推出「同心為香港」活動，鼓勵港人消費支持家園。期間，國泰亦在非盈利狀態下繼續營運，保持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聯繫。新冠疫情過後的經濟復甦活動亦不遑多讓。在這些困難時期和隨後的日子，全球的航空公司都致力為其國家和城市的整體利益作出貢獻。

驅動樞紐發展

然而，本地航空公司對總部所在地最大的建樹，是把該城市打造成全球樞紐。航空公司透過航線網絡，運送商務旅客和遊客往返其主要樞紐，從而直接為樞紐網絡的發展作出貢獻。

換句話說，本地航空公司不單運送乘客往返香港，還經香港飛往其他地方，並將本地市場擴展至遍及全世界。

隨意觀察就可知航線網路對旅客行程影響甚大，例如從墨西哥前往中國內地的旅客，若選購日本航空的機票，就不太可能途經香港。從澳洲前往歐洲的旅客，若持有馬來西亞航空或新加坡航空機票，則不太可能經過曼谷或香港。外匯都轉給別人，不屬香港了。同樣道理，如果國泰航空擁有強大的網絡，就更有可能吸引旅客經香港轉機，為香港帶來相關的好處，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世界航空樞紐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航空公司及其樞紐正在環球舞台上競爭國際業務。

國際航空業的競爭愈來愈取決於「網絡實力」。航空樞紐的實力則取決於其向外輻射的連接航線所帶來的倍增效應。要大幅加強樞紐的對外聯繫，需要高航班頻率、航網規模、具競爭力的服務，以及航班協調。這些只有強大的本地航空公司才能做到。

香港至科倫坡航線就是一個好例子。香港與斯里蘭卡之間的點對點旅客數量相當有限，難以提供定期航班服務。然而，國泰航空透過香港提供的策略聯繫，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北美、日本、韓國、菲律賓甚至澳洲的乘客經香港飛往科倫坡。因此，香港人現可享受定期直飛斯里蘭卡的航班服務。國泰航空熱衷於開發點到點市場，原因清晰不過，當然有利兩地的旅遊業和貿易發展。

然而，如國泰航空不再獲准開辦這條航線，又或者基於經濟上的考量（例如高昂的航空成本或供過於求）無法開設航線，那麼別說兩地之間的直航服務，就連香港樞紐所提供的整體網絡聯繫亦將受損。那些原本經港的旅客流量也會轉移別處。

強大的本土航空公司不會「排擠」同業，這與部分人表達的觀點相反。事實上，它往往會為樞紐招徠更多航空公司。以法蘭克福和新加坡為例，漢莎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分別在兩地的機場享有 55% 和 40% 的航班起降量，但亦無阻外國航空公司經營法蘭克福和新加坡航線的意圖。其他航線的例子多的是：倫敦、紐約、東京等的機場都十分繁忙，但還有很多航空希望插足這些市場。發展強大的本土航空公司有助確立樞紐的核心，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前往經營航線，進而拓闊聯繫網絡。

一個城市即使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甚至輝煌的歷史，但若缺乏具實力的航空公司，就很難吸引足夠的國際航線，更難成為偉大城市。以位於西歐中心的布魯塞爾為例，它是北約和歐盟總部所在地，歷史名勝和旅遊景點眾多，卻缺乏強大的本土航空公司。前往比利時的旅客，通常會取道航班較頻繁及聯通性較強的大城市，如倫敦、阿姆斯特丹或法蘭克福。

反觀倫敦和阿姆斯特丹，雖然所處地理位置較布魯塞爾偏離歐洲大陸中心，但如今兩大城市的發展程度卻勝過布魯塞爾。英國航空和荷蘭皇家航空的實力，足以為兩地的持續發展提供支援。阿姆斯特丹亦因而一直保持其作為貿易中心的地位，且別說荷蘭已持續獲得世界一大領先海港的美譽。

本地航空公司對當地經濟貢獻的重要性，體現在航空公司本身、當地政府、機場、監管機構和航空當局共同努力，確保樞紐能夠實現最大的經濟價值。機場基礎設施和相關項目，以及航空公司對資本需求極高，促使各方必需通力合作。

新加坡正是箇中表表者，其政府為這個人口不到六百萬的國家建造了世界最佳機場之一。早在 1972 年，時任總理李光耀就已對一家強大航空公司所帶來的可觀經濟回報一槌定音：「新加坡經營一家航空公司……從中可得的經濟利益顯而易見。」多年來，幾位部長都對同一主題加以闡述。1972 年時新加坡立國不久，正面臨許多嚴峻挑戰，人口不多，但卻制定發展航空業的宏大願景。多年前該國 20 元和 100 元的舊鈔背面，也印上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圖像。即使在今天，每逢在電視上播放國歌，新加坡航空的圖像也會在電視屏幕出現。

本土航空公司和科技變革

科技變革可以改變貿易通道，削弱城市的偉大鋒芒，歷史不乏先例。隨着新式高速帆船的誕生和航道改變，歐洲和亞洲之間相繼出現新航線。威尼斯、西安、果阿和馬六甲全都因而失色，不復當初。

在航空領域，科技進步發展使飛行航程更遠，航空公司毋須在長程航線中設置中途轉站。曾設於香農和檀香山的轉機服務從此消失。飛機能夠不間斷地長途飛行，令不少昔日作為中轉站的城市遭遇同一命運。

話說回來，中東的杜拜卻證明此非必然。在強大而活力十足的本土航空公司協助下，即使出現技術變革，中轉樞紐仍然大有可為。1970 年代，往返歐洲和亞洲之間的航班通常會在中東（特別是巴林）中途停站。1980 年代，航空科技的進步令航機得以直飛目的地，

而無需在中東停留，這對巴林和杜拜等城市作為航空運輸樞紐的角色構成威脅。然而，總部位於杜拜的阿聯酋航空，憑藉本身雄厚的實力和快速發展，保全杜拜作為全球航空樞紐的地位，杜拜亦興旺發達。如今，阿布達比和多哈也施展同一策略，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貨運的角色

在有關貿易和運輸路線的討論中，航空貨運的重要角色不可不提。空運增長顯著，而且在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亞洲地區，貨運在航空公司盈利中佔比頗大，不少區內航空公司的收入有 20% 至 40% 以上源於此項業務。

鑑於很多貨物以機腹（客機底部貨艙）運載，因此促進航空中心發展的政策不應忽略貨運的影響。在論及航空交通時，若將航空貨運視為另一行業未免失當，皆因此一業務往往是確保現有和新增目的地客運服務得以維持的一大要素。

然而，一個城市單靠運載貨物，仍未足以成其偉大。且看美國、歐洲和亞洲吞吐量最大的海運和空運港口，能被視為全球最偉大的城市屬鳳毛麟角。

香港的機遇

有部分人建議，香港要另闢蹊徑成為成功的航空樞紐。先此聲明：香港現已是世界領先的航空樞紐之一；而作為一個偉大城市和重要的貿易中心，它扮演着令人欣羨的角色。香港的機場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一年，國際客運吞吐量達 7,500 萬人次，屬全球頂尖。在國際航空貨運方面，香港無疑位居第一，須知香港總人口只有七百萬而已。香港的國際機場更是全球首屈一指，成就斐然。

香港作為航空中心，斷無被視為有所不足或水平不夠之理。航空業多年來取得的可觀增長，在區內備受推崇。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中央政府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並一直對特區政府予以支持，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將香港建設成國際航空樞紐，近年亦已啟動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的願景。政府高瞻遠矚的政策以及航空業同人齊心協力固然重要，但競爭對手大有人在，香港要保持領先地位，就必須致力鞏固其驕人成就所繫的各項要素。

為了保持領先及不斷提升，我們應考慮以下關鍵問題：

1. 如何改善航空運輸設施和基礎設施？
2. 如何提升和加強本土航空公司的角色？
3. 本地航空業如何與相關產業互補，以及促進彼此發展？

下文就對以上各點加以扼要分析：

1. 基礎設施

當年的啟德舊機場早已沒有發展空間，窒礙了本地航空業施展擴展大計。1998 年啟用的新機場可謂為香港基礎建設上的一大豐收。新增容量亦被善加利用。如今，香港國際機場新建的第三跑道和大量令人矚目的新設施和服務，更為航空發展提供了最佳舞台。無論對本地居民、外來訪客、過境旅客以至貨物而言，這個世界級機場也是極為理想的航運基地。

航空成本須合理及具競爭力。高成本令航空公司裹足不前，尤其是本土航空公司。各地政府均須牢記乘客數目增加的乘數效應，亦不應忽略其對經濟的整體效益。此乃全球層面的競爭，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機場都能認清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競爭力。

僅僅擁有一個好的機場並不足以保證能發展為航空樞紐。沙迦、吉達、吉隆坡和珠海都設有優質機場，但它們未來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自本土航空公司的表現是否理想。吉隆坡的機場雖好，但很多人去新加坡，可能是為了在新加坡搭乘另一航班離開。新加坡航空的網絡強大，從而吸引馬來西亞客流到新加坡樞紐。

2. 香港必須加強航空業

特區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確保香港的航空公司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得以進入相應市場，與海外對手有效競爭。

雖然這是一個充滿政治和外交色彩的行業，涉及巨額而專門的資本投資，但特區政府不可能像某些國家的固有做法，向本土航空公司給予補貼或「特殊待遇」。這從來就不是香港的行事方式，補貼只會扼殺營商動機。反之，政府可恪守自由市場原則，只要便利營商就已有助提升香港及業界的競爭力。

航空業與本地運輸業截然不同。正如上文指出，航空業的競爭對手遍及全球。政府應以非常積極的態度面對航空業發展。航空公司的利益與政府的願景和政策必須同步，才能產生協同效應，造福香港和中國。

有人主張應任由外國航空公司無限制地提供往返以至飛越香港的航班，目的在於增加更多航班和擴大客戶的選擇。香港從來無懼競爭，我們亦應歡迎其他航空公司經營飛往香港的航線。但不得不察的是，海外航空公司的主要動機，畢竟是將客流引回本國樞紐。游說香港單方面讓步的國家和航空公司，鮮有投桃報李，批准香港拓展當地市場及取回相對利益的要求。航空業務決定既然仍由政府之間協定主導，單方面讓步無異於任由本地航空業慢慢消亡，導致樞紐逐漸萎縮。

許多評論員都忽略一點：歸根究柢，香港航空業已很自由開放。若只會封閉自守，香港斷不可能發展出躋身世界前列的一大國際機場。將香港與數以百計目的地連接起來的航空公司多不勝數，這凸顯出政府近幾十年來實施雙邊政策乃明智之舉。

要確保香港未來保持作為領先航空中心的角色，關鍵因素之一繫於中國內地。內地是香港的一個龐大市場兼航空腹地，其重要性將會愈來愈大。相對於現時的美國，中國的航空旅客和內地航空的機隊規模還大有增長空間。事實上，中國的增長速度非常快；香港必須繼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這將有賴特區政府和本地航空公司擔當有效的角色、香港作為航空樞紐的實力，以及大眾旅客的利益。

3. 發展相關產業

首先，旅遊和遊客活動和景點乃吸引旅客所需條件。政府及各界在這方面提供更多資源都是好事，但活動和景點本身並不足以吸引訪客。佩特拉古城、吳哥窟、馬丘比丘和阿格拉泰姬陵都有甚多景點，但要到此一遊有何辦法呢？事實上，前往一些「畢生夢寐以求」目的地的訪客數量竟還不及一些相對「沈悶」的城市！皆因這些「沈悶城市」是航空樞紐，具備較理想的本土航空公司網絡。

要促進旅遊業還有其他重要方法。適當且有效的市場推廣不可或缺，而有關方面亦正悉力以赴。簽證要求也是另一個考慮因素。正如在許多國家所見，一旦簡化入境手續，就會吸引更多入境訪客。

在一般人心目中，零售、飲食和酒店業與航空業息息相關，但相關行業其實還有更多，包括航空業在材料、維修、餐飲、娛樂、採購等方面的直接供應商，而更重要的一環是與航空相關的服務業。倫敦能成為全球一大航運中心，全因其具備各種支援業務，如法律服務、金融、保險、仲裁和調解、註冊、設計、採購、資訊科技等等。同類例子不勝

枚舉。尤其中國(和香港)航空業正處於快速增長的階段，香港沒有理由不能發展相關行業。

作為航空中心的香港

香港地理位置優越，從香港起飛，五小時內的飛行半徑就能涵蓋中國內地、日本、韓國、東南亞和印度大部分地區。也能到達澳洲北部，亞洲各大城市和世界一半人口亦包括在內。五小時飛行圈裡包括外匯儲備最高的八個國家或地區之中的七個。想必大家都同意這個五小時生活圈區域著實涵蓋了經濟增長潛力最高的地區。

毫無疑問，未來亞洲人的出行人數將會大幅增加。目前亞洲國家的旅客比例依然偏低，反觀英國、荷蘭或德國，每年則有 35 至 40% 的人口搭乘國際航班出國。在亞洲，日本的旅客比例僅為 12% 左右，韓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今天中國內地這一比例可能還要低得多。但試想區內國家日益富裕，前景又會如何？50 年前誰又能預測中國內地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強勁？

香港勢將受惠於亞洲的經濟增長。我們必須同心戮力，抓緊機遇，以招徠入境或過境的旅客！

毫無疑問，香港位處「亞洲中心」。這座城市的歷史及成就無庸贅言，但更重要的議題是如何確保佳績得以延續。

當此新世紀之際，要在世界舞台上保持偉大城市的優勢，離不開航空聯繫的強度，而這正取決於特區政府的遠見和本土航空業的實力，以及其對香港樞紐成功的堅定決心。

香港將從亞洲航空的增長中獲益匪淺。縱使高低起伏在所難免，但遠見、韌力和決心，終究是實現宏大願景的關鍵。

香港人素以「香港精神」，亦即勤奮、創新和活力見稱，再加上特區政府推行適當的政策，以及本土航空公司的努力，我深信香港定將不斷提升其航空樞紐中心的地位，並繼續躋身世界偉大城市之列。

參與學者

Douglas Arner 教授	香港大學嘉里基金教授 (法學) 研究資助局數碼金融與可持續發展高級研究員 「港大 - 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協理總監
Karen Grépin 博士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經濟、政策和管理學副教授
王欣儀教授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商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系副教授
王柏林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方翔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
方偉晶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教學) 人口研究中心主任
全劍超博士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衛生經濟、政策和管理學臨床助理教授 (與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聯合聘任)
朱曉冬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學術領域主任
貝大為教授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經濟、政策和管理學臨床教授
洪雨林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博士生
陳南祿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與策略實踐教授
陳禧音女士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經濟、政策和管理學博士生
張超藝先生	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張麗晨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黃美施教授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沃頓房地產系澤爾 / 盧裡房地產中心格雷肯國際房地產 項目助理總監 詹姆斯·T·裡亞迪 副教授
劉洋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 (對外事務) 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關穎倫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

按姓氏筆劃排序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4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4

Publisher: HKU Business School
出版者：港大經管學院

Address: 4/F., K.K. Leung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梁球琚樓 4 樓

Website 網址： <https://www.hkubs.hku.hk/>

Email 電郵地址： fbecomm@hku.hk

Version: January 2024 (Hong Kong - First Edition)
版次：2024 年 1 月香港初版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